

独立阅读

2008 年 8 月

细则

- 1、阅读报告力求独立但不宣称中立，撰写过程谢绝图书作者、出版者、发行者介入，观点尊重个人趣味，不求客观统一。
- 2、自 2007 年 7 月 1 日起，阅读报告执行编辑谢绝出版机构赠书，赠书将自动排除出推荐行列。师友赠书将注明图书来源，对于相关部分，读者可以抱十倍怀疑之态度。
- 3、阅读报告欢迎读者提出不同意见，将选登部分批评类读者来信，但谢绝只有观点没有论证过程的批评。
- 4、阅读报告观察员欢迎申请加入，但谢绝出版从业人员参与，来信烦请告知专长领域并附上阅读报告一份。
- 5、阅读报告欢迎订阅，凡订阅者将成为阅读报告的定向发行对象，在第一时间与阅读报告小组共享阅读成果，读者来信、作者申请以及订阅事宜，烦请发信至 shrbooks@gmail.com。

执行编辑：苏小和、王晓渔、成庆

助理编辑：李伟为

观察员：写作：戴新伟（广州）、朱 白（广州）、罗四鸽（上海）

经济：苏小和（北京）

思想：成 庆（上海）

文史：王晓渔（上海）

艺术：言 一（成都）

特约撰稿人：羽良（北京）、严飞（香港）、莫之许（北京）、吴强（德国·杜伊斯堡）、张昕（美国·洛杉矶）、刘柠（北京）、汪伟（上海）、沈展云（广州）、马慧元（加拿大·温哥华）、曾园（昆明）、凌越（广州）、孙骁骥（英国·谢菲尔德）、程明（济南）、马庆（上海）、张无极（网络）

特约翻译：陈丹丹（南京）

编者按：

同一个世界，不同的生活。8月，虽然奥运成为重中之重，我们依然可以选择其他的生活方式，出游或者闭关。当然，阅读也是一个选项，与其他选择并无冲突。

这里需要向诸位汇报的好消息是，“独立阅读”(<http://chinairr.com.cn/>)网站已经正式开通，以前各期“独立阅读”，均可以在那里下载。您还可以注册自己的空间，与“独立阅读”的作者交流或者成为作者。

“独立阅读”见！

目录

阅读报告·中国大陆

写 作：朱 白

罗四鸽

经 济：苏小和

思 想：成 庆

文 史：王晓渔

艺 术：言 一

阅读报告·台港海外

香 港：严 飞 香港独立漫画25年

英格兰：孙骁骥 BBC内部的“主义之争”

追念·索尔仁尼琴

王晓渔：我们依然需要重温索尔仁尼琴

书评

汪 伟：裸奔是最古老的奥运项目

张无极：苏联的文学G点

戴新伟：承担一小块土地

羽 良：现代化、民粹主义与官僚威权

温故

戴新伟：藏在旧书店的大师傅

声音

马慧元：舒伯特的四手联弹

译介

阿莱克斯·罗斯：百万交响：中国音乐大跃进（一）

布里特·皮特森：达尔文来拯救：部分学者相信进化科学能振兴文学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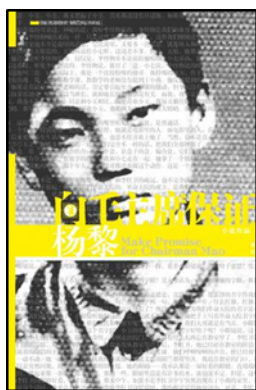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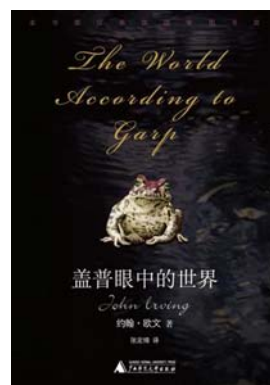
阅读报告·中国大陆

WRITING 写作

特约撰稿人 朱白 (广州, zhubai@tom.com)

尽管我们一再地读书了,但还是可能会在越多发现、越多阅读的同时,也在越多地遗漏和忽略。这是一个悖论,无法过多解释,也无需解释。就好比现在的收藏热一样,你越多地掌握收藏常识、越多地有了见识和能力,就有可能越多地错过、遗漏和失去更多的宝贝。此时,是燥热的夏天。广州的夏天则更加变态,所有的一切跟清爽无关,只有当听到一个女孩子高兴地说“还可以扣孩子他爸”时,一阵的天真之气兴许还会让人清爽一点。不过,这跟“阅读”没什么关系,只跟矫情有关。如此燥热之下,产生一点忽略也不是什么坏事。

约翰·欧文是一个重要的被忽略的作家。这样说,当然不是说每个人都忽略了他,如果是这样,不会有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两本刚刚出版的书(《盖普眼中的世界》、《寡居的一年》(张定绮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7月)。我的意思是,他在我这被忽略了。又当然,我算个什么东西呢?我只是遗憾,没更早地读到这位作家。其实说更早,是应该有机会的,上海译文出版社最早2002年的时候就出版过他的《苹果酒屋的规则》(刘国枝译),按理说这部被改编拍成了电影的小说,应该更有可能与读者结缘,但很遗憾,除了我自己还有我周围的朋友没听说有人读过这本书。说这么多,无非是想向看这份报告的读者郑重推荐这位作家,他的两部新出版的小说对我而言,完全属于那种意外的惊喜(这种惊喜好比你交往了一个不短时间的女朋友,突然有一天发现,她竟然还会做你最喜欢的那道菜),这份惊喜值得再三寻找原因,以及更加享受这份阅读带来的喜悦。《盖普眼中的世界》的故事,讲得非常幽默,而且手段高超,但是你知道,这是一个悲伤的故事,比如主人公盖普的出世,就是一个非常让人绝望的事情——盖普年轻的妈妈当初不打算和男人干那种事,但是她喜欢孩子,并且觉得自己也应该有一个,她的办法是和一个在战争中变成白痴并且将要死去的军人怀孕。顺便说一句,盖普的爸爸在战争中被弹片击中变成白痴后唯一的乐趣就是自慰,盖普的妈妈正是利用这个满足了自己当母亲的愿望。跟约翰·欧文的《苹果酒屋的规则》一样,作家没有“狠毒”地为我们提供一个不可和解,以及绝望黑暗的世界,到最后,都会有一个看似光明的归宿。这大概也是约翰·欧文可以被广泛阅读的理由之一。需要赘言一句的是,这两本约翰·欧文的小说,都是台湾翻译家张定绮的手笔,他的语言恰到好处,应该看成好翻译的一个典范。



对于翻译来说,不一定需要多么优美的语言,我这个外行的看法是,一种贴近原作者风格的语言就是最好的翻译语言。语言这个东西很奇怪,没有统一标准的好,同样是好的语言,换一个气场,它可能就完全不合适了,也许还会成为糟糕的一种。说到语言,诗人杨黎总被说成是一个有伟大语言特色的大师,他对汉语的贡献即便被再三说起,可直到今天好像也没被真正重视。但是,对于杨黎来说,这又是一件无所谓的事,或者说语言、贡献、大师,这些跟杨黎又有什么关系呢?他的长篇小说《向毛主席保证》写成于2003年,五年之后杨黎自己将它印成书,并用自己的方式叫卖。300元一本,印数300本,这种对得起这部作品的方式既是不得已,也是一种骄傲。不管我们对当代汉语小说以及当代写汉语小说的人多么失望(这种事情还轮不到我们绝望),需要承认一个事实——如果现在有一百个杨黎,在各个方向上做事,写出各种各样的小说,那么汉语小说绝不至于像今天这样一提起来就让人觉得没劲。《向毛主席保证》里的主人公是一个十三岁的少年,所有的故事几乎都是通过他的性意识展开的,从一个刚刚有了性意识的少年眼中,你看到的或许是一个不那么混沌的世界。

看安迪·沃霍尔的书和听他讲话,总觉得是一回事,我的意思是,你读这本《安迪·沃霍尔的哲学》(安迪·沃霍尔著,卢慈颖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6月),跟之前看《我将是你的镜子:安迪·沃霍尔访谈精选》(肯尼思·戈德史密斯编,任云荃译,三联书店,2007年7月)是一回事,没有了前面那个引导他说出各种惊世骇俗的话的人,沃霍尔也

一样能把这件事干得漂亮。当他说出“商业是最好的艺术”的时候，相信沃霍尔不但是个严肃认真的写作者，而且他更是一个靠立说来推动自己每一个字的那种人。

我们总是能看到很多美国作家的书出版，甚至是再版，这并非我们的出版人有什么偏好，而是从普遍价值来讲，美国人的确是做得太好了。至少可以这么说，20 世纪里的美国作家、导演、音乐家、艺术家们，他们是这个星球上干得最漂亮的一伙人。当然，没人按简单国家来区分群体，但是我愿意就此对美国人这么多年来干得这么漂亮而赞叹一句。索尔·贝娄这位美国的犹太人，20 多年前就获得了肯定和荣誉，在中国，他的书也一再被出版，这本《赫索格》（宋兆霖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 年 6 月）也同样不是第一次露面。在我看来，《赫索格》虽然在索尔·贝娄的作品中很受欢迎，但却不是最迷人的一部。这部描写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赫索格》，虽然里面的问题和障碍可能是超越特定人群的一些普遍问题，但总的来说还是不够共鸣，也就是说这种只能是作为社会问题来呈现，而无法来用人性解释。比如，库切的笔下卢里虽然也是一位教授，并且境况更加极端地是在殖民地地区，但他身上所呈现出来的是“人”的问题，一个人的耻辱和困境可以在卢里那里听到回声，这种回声或者说共鸣，大概就是文学作品的魅力之一。



如此买书、看书，想必大家渐渐都会遇到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藏书”，尽管你可以说，看书就是为了看看而已，何必因为“藏”这种附属的繁冗而劳神呢，但是你得承认，即便你轻易就选择了“不藏”，其实也是一种对“藏书”的选择和回应。三联书店的“新书话”系列，就出了一本《藏书的乐趣》（卢修斯著，陈瑛译，2008 年 5 月），这本书讲的不仅仅是一些关于藏书的经验，还包括很多跟书打交道的趣事和方法。不管是书虫、书迷，还是寻找趣事打发时间的人，看《藏书的乐趣》不会失望，对于作者这样的“大玩家”来说（作者卢修斯是德国著名藏书家，不过这个西方的藏书家跟我们藏书阁里的藏书家就大大不一样了），找出段子让人享受般地去了解这些藏书趣事，真算不上什么难事。



有一种文字，它的本身是否具有美感已经不重要了，因为它承载了一种值得缅怀和纪念又往往是我们“忽略”的东西，比如几年前出版的《往事并不如烟》（章诒和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年 1 月）。新出版的《三生影像》（聂华苓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年 6 月），也属于这种。《三生影像》应该算是旧作《三生三世》的“再版”，但正是因为增加了近 300 张的照片，因此可以重新命名“三生影像”了，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这也是一部容易“忽略”的书。作者聂华苓是著名的华裔女作家，她在美国不仅仅是生活、写作，更广为人知的是她参与的“国际写作计划”，这是一个多少有点乌托邦色彩的计划。聂华苓用自己传奇的人生为底本，描绘了一个大时代的记忆，一个大时代下的人与事的记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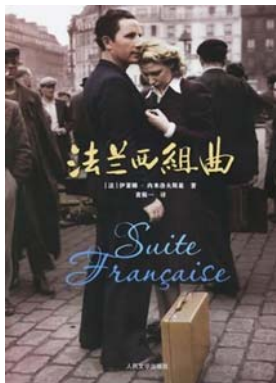
奥运的圣火在北京点燃，你可以为运动员加油助威，也可以选择在这样的一个喧嚣的日子里多多阅读。我觉得，正如这世上的很多悖论一样，有可能最喧嚣的时候也是另外一种意义上最和谐、最安静的时候。阅读大概可以不分季节，甚至也可以不分地域和年代，你可以在成熟的年纪读一下《向毛主席保证》这种描写青春期少年的故事，你也可以在各种问题不断困扰的午后去读一读带着满身清爽和幽默笑料的《盖普眼中的世界》，你还可以在这样的酷热夏天里领略一下某本书里的严寒世界……在一个容易被忽略的角落，作为一个被忽略的人，读一本被以往自己忽略的书，这是一件多么惬意和无法忽略其美感的事情啊。在这点上，如此阅读也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

WRITING 写作

特约撰稿人 罗四鹂（上海，luosiling_china@163.com）

1940 年，巴黎大逃亡。失去了工作、没有了经济来源、唯一的儿子生死不明的米肖夫妇历尽千辛万苦回到巴黎的家，“他们在打开的窗户前坐了下来。每个人的膝头摊着一本书，但是他们都不在读。最后他们靠着睡着了，手握在一起。”

这是俄裔法国犹太女作家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在《法兰西组曲》（袁筱一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年 5 月）所描



绘的乱世流亡众生相中一幅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画面。内米洛夫斯基用西西弗斯的勇气所描绘的这幅流亡图——麻木与惊恐的土地、乡间破屋和走廊，喧嚣的忙乱的汽车，堵塞了各条马路的伤员，精疲力竭、饥肠辘辘的女人和孩子，被抛弃的妓女，举家逃离的情人，作家科尔特、收藏家查尔斯·朗日莱、势利的国家博物馆馆长夫人以及自私、虚伪的大小资产阶级们——在我脑中越来越模糊的时候，这对膝头各摊一本书，手握手相互依靠在窗户前睡着了夫妇却依然如新，还有那位在德国人入住自家园子之时，仍在膝头放一本书的露西尔。让我在闷热、喧嚣的七月，不由得在膝头也放上一本书。

罗马尼亚裔犹太人、幸存者诗人塞南说，“没有人能代替见证人作见证。”内米洛夫斯基没有幸存下来，1942 年夏，39 岁的她被杀害于奥斯维辛集中营，意在“尽一切可能努力尝试人们会在 1952 到 2052 年关注的事情和论战”的《法兰西组曲》只完成五部曲中的两部，且在一个箱子里颠沛流离 62 年后，才由她的长女德尼斯取出来重见天日，此时，几乎被淹没和遗忘的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才再次出现在世人面前，用无人能替代的才华和独特的视角悠悠地给我们见证那段疯狂的历史。

实际上，早在 1929 年，内米洛夫斯基分娩前匆匆寄往格拉塞出版社的处女作《大卫·哥德尔》就以“才气逼人、残忍、大胆，并且笔法老道”震惊法语文坛，让当时陷入困境的出版人格拉塞窃喜不已。《舞会》则是她在写作《大卫·哥德尔》间隙时完成的一部短篇小说，如今两篇小说放在一起出版，成为《大卫·哥德尔；舞会》（袁筱一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 年 6 月）。在被现代、后现代手法技巧弄得头晕目眩之后，重新回到内米洛夫斯基传统的叙述中，竟有几分久旱逢甘霖之喜。不过，《大卫·哥德尔》在当年引起的震动，并不仅仅在于小说的艺术，更多的是作者的身份与小说主题的冲突：一位犹太作家塑造了一位冷酷、无趣、爱财、奸诈的犹太商人，将当时社会对犹太人的偏见无情地安放在自己塑造的小说人物中。为此，作者遭到一片“反犹主义”的谩骂，当时一位犹太作家在一份突尼斯出版的《犹太觉醒》的周刊上尖锐说到，这是一部“背信弃义”的杰作。对此，内米洛夫斯基没有解释，而是继续在她的作品《猎物》（金龙格译，作家出版社，2007 年 1 月），《孤独之酒》（黄旭颖译，作家出版社，2007 年 8 月），《伊莎贝尔》（徐晓雁译，作家出版社，2007 年 8 月），《狗与狼》（管筱明译，作家出版社，2007 年 8 月）等中，用残忍、讽刺的词汇为那个时代的犹太人画像，辛辣精辟，入木三分。因为在她看来，写作的唯一标准是文学价值，而不是身份、民族或是国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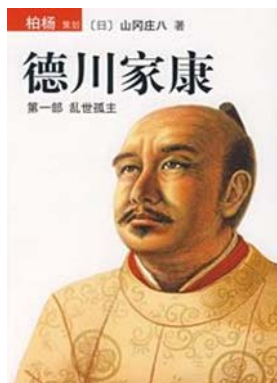


在 10 年后的《法兰西组曲》中，内米洛夫斯基依然坚持着自己写作标准和文学选择：作为一位受害者，她没有选择受害者的立场对法西斯进行控诉，而是对遭受灾难的法国人进行了批判，因为绝不能把仇恨“转嫁到一群人身上，无论他们是何种族、宗教，无论他们有什么样的使命、偏见和错误”，“如果用一个词来谈论悲惨，就要用十个词谈论自私、怯懦、团体和罪恶”。在她眼中，灾难的制造者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灾难的纵容者。

比内米洛夫斯基小 3 岁的汉娜·阿伦特同样亲历了 1940 年的巴黎大逃亡，幸运的是，阿伦特在第二年成功地逃亡到美国，继续自己的思考，10 年后的 1951 年，《我们时代的负担》(The Burden of Time)出版，1958 年再版时增加了一个结论《意识形态与恐怖》，书名也改《极权主义的起源》。虽然阿伦特的著作和传记在国内已不下 10 种，她的名字和思想对读者来说也早已不陌生，然而她这本极权主义系统研究的开山之作、第一次系统描述人类在极权主义统治下的生活，并通过对传统社会的比较研究，在理论上做深入总结的《极权主义的起源》（三联书店，林骧华译，2008 年 6 月）却是千呼万唤始出来。

几乎就在阿伦特以犹太人的经历体验动笔写《极权主义的起源》的同时，美国女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受美国政府委托，以战时在美国拘禁的日本人作为调查对象，写成著名的报告《菊与刀——日本文化的类型》（吕万和、熊达云、王智新译，商务印书馆，1990 年 6 月），将日本文化的特征概括为与西方的“罪感文化”不同的“耻感文化”，并用“菊”与“刀”来象征日本人的矛盾性格和文化的双重性。不过，如柏杨所说，“要了解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唯一的方法是阅读他们家喻户晓的文学作品——而不是阅读学院派的经典著作。”了解日本亦然。要深入而轻松地了解日本，日本历史小说家山冈庄八在二战后花费 17 年时间完成的 550 万字（汉字简体字）巨著《德川家康》（[日]山冈庄八著，南海出版社，2007 年 11 月至 2008 年 6 月，前 10 部）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日本战国后期，群雄争霸，德川家康最终击败织田信长、武田信玄、丰

臣秀吉等家族，结束战国烽烟，开启 260 多年的太平之世，德川家康的隐忍而又不驯、好学而又保守、喜新而又顽固几乎可以说是“菊”与“刀”的最佳演绎。



这位将日本封建社会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的德川幕府创始人的一些治国举措如注重内治、提倡文治、建立幕藩体制以及后来的锁国政策，与他所崇拜的、长他 215 岁的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有几分相似。有趣的是，在不少书店和网站的图书销售排行榜上，至今已推出 13 部中的前 10 部的《德川家康》，与当年明月的 5 部《明朝那些事儿》（中国友谊出版社）也有的一拼。若在加上山冈庄八的另两部大块头《织田信长》（[日]山冈庄八著，杨世英译，重庆出版社，2007 年 10 月）和《丰臣秀吉》（[日]山冈庄八著，郭宏达译，重庆出版社，2008 年 1 月），以及司马辽太郎《丰臣家族》（陈生保、张青平译，重庆出版社，2008 年 5 月）、海音寺潮五郎的《上杉谦信：天与地》（陈宝莲译，重庆出版社，2008 年 6 月）和吉川英治《宫本武藏》（颜世俊，刘仲达译，重庆出版社，2005 年 12 月）等，日本战国的硝烟几乎已经燃烧到各个图书销售排行榜上，甚至进了盗版书摊。几乎在校园附近卖盗版书的每辆三轮车上，远远就能看到两块砖头厚的丰臣或织田或宫本，与五花八门的畅销书一争高下。

ECONOMICS&SOCIETY 经济社会

观察员 苏小和（北京，susumartin@hotmail.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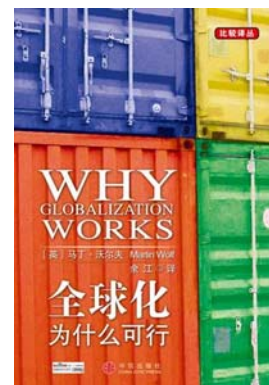
奥运开始搞了，举国保卫，神州放电。北京的地面上到处都是警察叔叔和戴红袖箍的大爷大妈，他们泛起油光的脸庞上洋溢着国际化的笑容，也一脸严肃地注视着所有可疑分子，尤其是我这样不喜欢带身份证更不喜欢办暂住证，但看上去绝对像中国人的人。是的，我是个非北京户口的外地无业游民，又死认为暂住证制度是个恶法，别人都办了，我得抵制，像梭罗当年抵制美国政府的税收制度一样。坚决不办，宁愿去昌平筛沙子，宁愿被遣返回我那美丽又寒酸的故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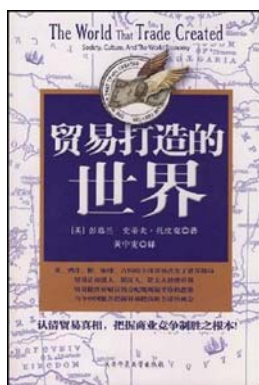
不过感谢政府，到我写这个稿子的时候，我还没有被组织遣返，因为我胆小怕事，一直躲在家里不敢出门，又住在郊区，距离美丽的鸟巢很远，所以警察叔叔和居委会大妈也没有半夜敲我的门检查暂住证。这种自我软禁的日子，刚好是读书的好时间。再次感谢政府，感谢全球化，感谢伟大的奥运会，感谢政府的出版社，高干子弟主管的中信出版社竟然出版了一本看上去不错的书，《全球化为什么可行？》（[英]马丁·沃尔夫著，余江译，中信出版社，2008 年 7 月）。说实话，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以为中信出版社只会出版《货币战争》、《水煮三国》这种十三不靠，专门愚弄大众读者的畅销书，没有想到，这一次他们开始研究全球化了。我的胆量由此大增，都全球化了，都奥运会了，那么多外国人来中国学习我们的改革开放、发家致富的经验，难道我还怕政府查暂住证么？

问题还是有的，我看到马丁·沃尔夫在这本书里竭力为全球化鼓与呼，饱满的激情几乎接近于闹腾了。我不知道是中文翻译的问题，还是作者本人的激情有加。常态下，我一般是不看这种激动复激动的书的，日子过得本来就闹腾，好不容易读一本书，还闹腾，人就没法活了。

不过，当我沉下心来翻这本书，里面详细的材料和数据，还是让我获益匪浅。激动有余的，是那些评论的部分，作者太热爱全球化了，所以他试图通过一本书，让所有的读者都像他一样去拥抱全球化。我查了查作者的资料，发现他是媒体出身，曾经获得过 2003 年的最佳商务记者奖，典型的新闻人，类似于复旦大学新闻系才子们的笔法，而不会是张五常或者是周其仁的那种经济学学院性文风。我这么说，是因为我越来越迷上了五常先生和周其仁先生的文章，他们散淡又细密，有点像当年的知堂老人闲适的作风，但这个时代的经济却挤满了他们的字里行间，那些专业得有些晦涩的经济学理论，竟然具有了小品文的品质了。

真正的高手总是不期而至。我再一次读到了彭慕兰的著作：《贸易打造的世界》（黄中宪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年7月)。彭慕兰一直对中国问题情有独钟。我曾经读过他的《腹地的构建：华北内地的国家、社会和经济(1853-1937)》(马俊亚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年8月), 该书获得了1994年的费正清东亚研究最佳著作奖。他的《大分流: 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史建云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3年11月), 甚至引起了东西方学界的重大辩论。在彭慕兰看来, 贸易打造的世界, 既是一个中间性表述, 也是一个历史学表述, 既没有对全球贸易化的过度赞美, 也不会对此进行过度贬斥。彭慕兰仅仅是陈述了这样一个客观的事实。很早以前, 国际贸易就将世界各地的不同民族联结起来, 虽然全球化程度在今天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但所谓的世界新秩序, 并非今天才有, 所谓的多元世界格局, 显然也不是最近才被发现。彭慕兰的工作, 就是想通过一连串的故事, 描述全球彼此相连的关系, 过去就存在, 现在存在, 将来还会继续存在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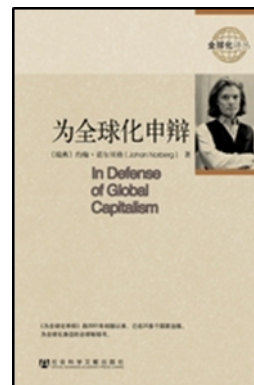
余英时在《现代学人与学术》中, 曾经对以西方学术范式为中心的局面深表遗憾。在他看来, 二十世纪以来, 有关中国学术的著作, 其最有价值的都是最少以西方观念作比附的。余先生甚至指出中国知识界似乎还没有完全摆脱殖民地的心态, 一切以西方的观念为最后依据。甚至“反西方”的思想也还是来自西方, 如“依赖理论”、“批判学说”、“解构”之类。以余英时先生的立场来看美国人彭慕兰, 发现他们竟然是方法论上的知己。

由此, 我对彭慕兰的阅读兴趣大面积高涨。沿着彭慕兰的思考路径说开去, 我们就应当建立起一种常识: 国家经济必须放在全球背景里去了解, 而国家经济和国家体制的差异, 正是构成全球环境的主要元素, 两者密不可分。国家制度的不同并不是人们拒绝全球贸易的理由, 事实上当你拒绝, 总有人会推着 you 往前走。没有一个经济体是一座孤岛, 也没有一个人能够真正置身于全球贸易之外。交流是一种历史的惯性, 开放也是一种历史的惯性, 那些固步自封、画地为牢的制度, 那些坐井观天的人们, 将为此受到惩罚。

如此看来, 资深的学院派彭慕兰比资深的媒体派沃尔夫显然要理性多了, 也冷静多了。对于一个有志于学术的写作者而言, 这的确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技术性问题。在更早一些时候, 我还读过一本与全球化有关的书, 书名干脆就是《为全球化申辩》, 作者更年轻, 《南方都市报》的编辑戴新伟先生在推出这本书的时候, 破天荒第一次将一个男人的玉照发在他金贵的第一版上, 理由是作者年轻有为, 金发碧眼, 实在是太帅了。

关于《为全球化申辩》, 秋风在电话里反复说, 作者诺尔贝格是个天真的年轻人, 这本书则是一本普及读物, 所以他翻译起来很快很顺手。不过遗憾总是有的, 比如编辑删除了一些与中国有关的敏感内容, 还比如出版社本来是想把这本书放在一套与全球化有关的丛书里, 结果发现其他的著作都在怀疑和抵制全球化, 只有诺尔贝格年轻的声音在为全球化赞美。

我也愿意张开双臂为全球化唱更多的赞美诗, 因为我看见众多的中国公司到美国、伦敦、香港上市, 资本链之下, 是无数的中国人充沛的工作机会、是渐渐看涨的收入和福利。我还看见新一代的中国人在相对宽阔的信息通道中自由游走, 在财务相对自由之后, 年轻的人们开始追求行走的自由和心灵的自由。虽然仍有人坐井观天, 仍有人画地为牢, 但世界已经为我们打开, 每个人都在全球化之中, 只要有足够的怀疑精神, 只要学会在多元状态下思考, 我们就再也不会轻易被遮蔽, 被蒙骗了。



THOUGHT&PHILOSOPHY 思想哲学

观察员 成庆 (上海, veron.cq@gmail.com)

7月的大半时光, 我都呆在西南山区的恩施小城里, 而当中有一个星期左右, 我跟随着父母, 去到农村老家, 或是去祭祖, 或是去一位刚刚逝去的亲戚家奔丧。山区的人情风物, 自然与都市大相径庭, 而每日早睡早起, 也让我暂时调整了夜半读书写作的生活规律。在深山里坐在微型货车的货厢里, 与赶场的老乡们挤在一起, 看着山路弯折和远山的雾气笼罩。在那

一刻，与自然的亲近和与山民们的交往，都让我感受到一种久违的亲切。

恩施小城，并非显赫之地，只不过聚居着大量土家族与苗族山民，依着大巴山脉与外界隔绝。不过在抗战时期，却也因山势险峻阻挡日军于山外，让此地成为当时避难的一片乐土。聂华苓就曾在抗战时避入恩施屯堡，读完了初中。这段经历，在她的《三生影像》（三联书店，2008年6月）中也有描述，在那个战火纷飞的时代，山里的日子单调平板，今日看来，足可以称为桃花源了。

这次回乡，恰好遭遇到一位亲戚长辈的过世，转车数次才能抵达到她在深山中的家，不仅依照农村习俗披麻带孝，而且还要一夜不眠，进行“守夜”。由此也让我见识到土家族传统的“跳丧舞”——撒尔嗬。这种舞、歌、乐夹杂的形式，歌词内容诙谐通俗，我站在二楼的小阳台上听的忍俊不禁，而参加丧礼的各位乡亲也是不时爆发出会心的笑声，难怪土家族把丧事称作“白喜事”，生死之间，尽管也有恸哭，但是却透露出一种达观与超脱。

正是在这些习俗之间，也逐渐让我意识到自己身上所容纳的几种不同的文化背景。小时候在山村的模糊记忆在这样的文化反刍过程中逐渐清晰起来。王明珂的《羌在汉藏之间》（中华书局，2008年5月）原本并未引起我的注意，许多关注似乎都是因为汶川地震而起，不过经过这次“返乡”，我注意到这本书对于西南少数民族的文化记忆的描述，也让人不禁自问，作为名义上的少数民族一份子，对于那些曾经浸染过，而今天已经渐行渐远的少数民族民俗文化，将持何种态度以自处？



回沪途中，转机过程中发现安检力度比先前回家时加强不少，看来8月8日的全民狂欢已经开始从日常生活细节上影响到一般民众了，上海、武汉皆是如此，遑论我们的首都北京？当然，任何一场全民狂欢都与政治有着密切的关系，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三联书店，2008年6月）虽然如今看来，有待商榷之处甚多，但是她所揭示的一个事实今天看来仍然存在，那就是国家权力对于社会生活如同毛细血管式的侵蚀，使得群众与权力在一些让人鼓惑的事业和口号下得以结合，产生出可怕的力量。这本由大陆译者林骧华先生翻译的名著，却只能先在台湾出版，辗转多年后方以“内部出版”形式现身，本身就可证明一点：让人恐惧的思想很可能是它道出了这个社会的一些真相。

谈国家，这里又不得不提施米特这位拼命要保卫国家的思想人物，他的《霍布斯国家学说中的利维坦》（应星、朱雁冰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6月）最近出版。不过对于这位多本著作已经翻译成中文的思想家，在这里列举他的观点是愚蠢的，因为从理解他到将其与我们的历史处境联系起来，我们或许需要很长的路要走，毕竟最终认识自己才是我们的第一要务。

每月推荐的书，大多都是枯燥无味的理论著作，这样的书阅读太多，而且不注意调节，读者自然也会觉得自己面目可憎，不食人间烟火。毕竟我们所阅读的这么多思想人物，本身也是有血有肉的凡夫俗子，逃脱不了欲望，也更逃脱不了生死。近日偶然发现的一本《巴黎高师史》（程小牧、孙建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6月）讲了许多关于巴黎高师这所培养出近代无数思想精英的学校的八卦，其中包括著名的阿尔都塞杀妻事件。尤让人感觉趣味的是，作者身为曾经的“高师人”，对于高师人身份的调侃与揶揄。比如对布尔迪厄批判法国大学精英子弟自我繁殖的机制，他不怀好意的加上注释，布尔迪厄的儿子也上了高师，这算不算“再生产”？



抛开八卦不论，这本书同样还提出了一个国人也在面对的问题，作为现代教育重地的大学，将以何种精神以自立？巴黎高师作为精英学校，但是却培养出一大批带有民主精神的思想人物。而我们的大学，明明已经堕落为高等职业学校，却仍然想涂抹成精英的摇篮，人才的胜地。想想常在媒体上看到的某些北大“名教授”对于北大的滥情赞美以及一种“伪精英”的姿态，就不禁想到，哪一天我们看不到这样的声音，而是培养出象巴黎高师那样不断生产“弑父者”的学生，中国的大学或许才有重新出发的可能。

7月是一个结婚的季节，梁朝伟与刘嘉玲也终于选择在佛国不丹完成了结婚典礼。当然，他们不是萨特与波伏娃，后者会把女学生送到萨特那里作公开的情人，而刘嘉玲一旦与巨富郭台铭传出暧昧，梁先生就已勃然大怒。如此看来，恋爱如果说是一场情欲迸发，结婚就常常是同居过后的无奈结局。布洛涅的《西方婚姻史》（赵克非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6月）是一本每位即将步入婚姻殿堂的青年都应阅读的著作，不过对于梁、刘这两位佛教徒而言，他们除开修习佛法修身养性外，还应补看本书，看看他们的婚姻，到底是属于哪一种类型。

HISTORY&CULTURE 文史

观察员 王晓渔 (上海, wxy1978@hotmail.com)

这个月搬家,基本都在跟书打交道,打包、装箱、搬迁、拆封、上架、整理。直到今天,房间的地板上还摆放着很多无法归类的闲杂书籍。我没有统计过自己有多少书,大概五、六千种,三天一本的速度,要五十年才能读完。看着书架,想着一生都无法读完这些书、一生将沦陷在这些书里,虚无得想把它们全部扔掉。回到搬空的旧宅,看着空荡荡的房间,竟然对远离书籍的生活充满想像。想像终归是想像,买书的进程没有因此中止,阅读也还在继续,只是写作放缓,这个月除了这篇阅读报告几乎没有写其他文字。

2006 年夏天,一夜读完何兆武《上学记》(三联书店,2006 年 8 月),东方既白。2008 年夏天,我用整整一个白天读完了牛汉《我仍在苦苦跋涉》(三联书店,2008 年 7 月)。如果在两本之间做个比较,我依然更喜欢前者。但何兆武只出版了《上学记》,讲述 20 世纪下半叶生活的《上班记》留中不发,成为传说。牛汉的自述更为完整,时间跨度从 20 世纪 20 年代到 21 世纪,采用“实名制”,只有几处使用了×××。从 1953 年开始就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供职的牛汉,是当代中国诗歌史的见证者,从胡乔木、周扬到艾青、田间,他都有着自己的判断。这位自称“热血老年”的诗人感慨,一辈子没有写过一首温柔甜蜜的诗,不是因为不喜欢或者不愿意写,而是没有甜蜜的生活,他感慨的不仅是自己,也包括他经历过的那些时代。



对于大陆读者来说,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林骧华译,三联书店,2008 年 6 月)也是一个传说。我已有它的英文版和复印的台湾版,这次终于能够拥有大陆版。此前主要阅读的是第三部“极权主义”,现在从头读起,有不少新的收获,阿伦特在开篇就将反犹太主义与民族主义区分开来,并且指出纳粹一向蔑视狭隘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的地方主义,他们一再表示自己的运动是国际范围的。这个观点听起来很突兀,仔细想想决非空穴来风,反对民族自治的通常正是那些打了引号的“国际主义战士”。由于中文版 1995 年就在台湾出版,很多朋友都认为译者是台湾学者,这是一个误会,林骧华先生供职于复旦大学。不过,虽然居住在同城,我从来没有听到过有关他的消息,只是记得他曾主编过四卷本《卡夫卡文集》(安徽文艺出版社,1997 年 8 月),还和伍蠡甫一起编过《现代西方文论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 年 1 月)。阿伦特也是卡夫卡的忠实读者,她认为卡夫卡在小说中表达了与她的政治哲学一致的思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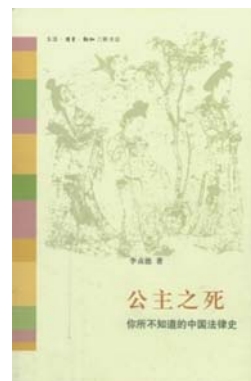


说到政治哲学,乔治·萨拜因的《政治学说史》(邓正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年 7 月)在江湖上失传多时,1986 年商务印书馆的版本不再常见。这次是重译,所以先推出上册。《政治学说史》并非客观中立之作,萨拜因坦承自己与大卫·休谟的观点是相似的:“以某种认为存在着一种确定的演进秩序或历史进步秩序的信念去取代那种有关理性不证自明的信念,乃是在用一种更无从证实的理念去替换另一种无从证实的理念。”我喜欢这种立场清晰的著作,在很多时候,“不偏不倚”不是中庸之道,而是平庸之道。这本书修订多次,修订过程映照出当代政治学说史:1961 年,作者表示过去十年整个世界乐于把希特勒忘掉,因此缩短了“国家社会主义”的篇幅;1973 年,修订者托马斯·索尔森先生表示过去十二年人们重新关注法西斯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因此又把原有讨论重新刊发出来。

政治哲学是灰色的,音乐之树常青。2007 年,马世芳的《地下乡愁蓝调》(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年 10 月)让我和一些朋友感到非常亲切,在这个隔岸的同龄人身上,我们看到自己的影子。现在,张铁志的《声音与愤怒:摇滚乐可能改变世界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年 5 月)又摆在了面前。作者在读高中的时候,曾对自己的摇滚音乐知识相当自负,但校刊上一位学长的文章,把他打回原形,重新认定自己只是幼儿园水平,这位学长就是马世芳。《声音与愤怒》探讨了音乐与政治的关系,事实上,台湾的流行音乐一直与政治密切相关,比如反复被歌唱的美丽岛是台湾威权时代民主运动的象征,可是此岸的耳朵往往不解此中意味,把美丽岛理解为美丽的岛、把绿岛理解为绿色如

茵的岛。张铁志关注的不是台湾流行音乐，而是英美的反叛音乐，它们的敌人通常不是威权，而是主流商业体制。张铁志指出摇滚乐既有可能成为号角，也有可能只是伴奏，如果寻求改造世界的可能性，必须和草根运动组织结合。看到这里，想起张广天，虽然我不反对甚至相当认同草根运动，但是对声称草根立场的张广天一直不以为然。“草根音乐”就像“底层写作”，很有可能走向自身的反面，最终既是反草根的、又是反音乐的，既是反底层的、又是反写作的。

写到这里，显得有些沉重。最后介绍李贞德的《公主之死：你所不知道的中国法律史》（三联书店，2008年6月），这是一本薄薄的册子，像史景迁的《王氏之死》（李璧玉译，上海远东出版社，2005年1月）一样，半天就能读完。这本书从驸马通奸、公主流产讲起，其间还夹杂着家庭暴力，具有一部肥皂剧的全部元素，但李贞德的目的不在于讲述一个已经不为人所知的花边故事，而是通过分析这次事件引发的共识和歧异，探讨中古时期女性法律地位。或许，认为这是一本轻松的书，本身就是出于男权视角。至少对李贞德来说，对这段历史细节的探讨，有着具体的现实意义，她在大陆版序言里感慨，直到2007年，台湾民法才通过修订，子女的姓氏不再强制从父，而是由父母约定。她还提及一个引发诸多争议的问题：“母权”究竟是女权，还是“父权”的分身？这个问题留给诸位朋友，聊以避暑。



ARTS 艺术

观察员 言一（成都，richard7briner@gmail.com）

说起来很有些巧合，对于“独立阅读”的不少撰稿人来说，七月大约都可算得上一个较为繁忙的月份。而我亦不例外。从月初的灾区之行，到后来连续的关于音乐和建筑的采访，每一件事情都在加深着我对这个世界，对当下的中国的了解；而了解之后，激起的更是对这一个个切入点跟进的欲望。可是，跟进除了需要欲望，更加需要相关的知识积淀。于是，一场恶补在所难免。

把战线拉的太长向来是我改不掉的坏毛病。这充分表现在，我在恶补社会工作(social work)和建筑理论的同时，并没有忘记温补电影理论。我开始较为系统的阅读巴拉兹，这个我喜欢已久的匈牙利电影理论家。《可见的人》是他的第一部著作，出版于1925年。之所以特别指明这本书的出版年代，是因为：如果忽略了这一时间点，可能将造成一些对本书的不必要的误解。

电影史上，第一部有声电影《唐璜》上映于1926年。它的出现不仅仅开创了电影的有声时代，并且也挽救了当时濒临破产的华纳公司。不过，无论是《唐璜》还是紧随其后的《爵士歌王》都只能算是有声电影的初步尝试，在这两部电影当中，声音主要以音乐的形式出现，对白亦是少的可怜。从而，有不少人认为严格意义上的有声电影的出现应当从1929年上映的《纽约之光》起算。可是无论是1926还是1929，都晚于巴拉兹这本《可见的人》的写作年代。所以，必须注意的是：他在这本书中的所有分析和论断都是针对默片——无声电影而言的。



如果你对历史和细节足够敏感，那么1925年便不仅仅是一个电影史的坐标。它同样也是一战与二战的间隙；其时，马克思主义的幽灵正在东欧四处徘徊。考虑到巴拉兹的匈牙利背景，那么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巴拉兹是不难想象的。事实上，正是在1919年匈牙利革命失败之后，巴拉兹流亡德国与奥地利开始从事电影评论工作。而这，才足以在很大程度上解释巴拉兹在书的开篇那对于把电影作为一门新兴艺术的热切呼喊，那种浸透其中的热情，实则亦是一种对革命的渴望。唯一不同的，只是这样一场革命显得稍微有那么一点远离了政治。

巴拉兹当年对于默片的分析，在有声电影一统天下的今天是否还能称得上是真知灼见呢？我想，这是一个不少人基于第一反应都会想要问出的问题。对此，我的答案是肯定的，并且我相信有相当一部分影迷的答案也同样是肯定的——在我的视野之内，有那么一群被我称为“黑白控”和“默片控”的人。对于“黑白控”而言，一切黑白的海报与电影都会使他们感到眼前一亮；而“默片控”则是几乎只看默片的人群，整个地沦陷于既黑白又沉静的世界里。他们的这样一种沉迷显然是不无

道理的（因为在他们当中本身有着为数不少的阅片无数的超级影迷），而巴拉兹的论述至少给出了其中一种。

我相信所有看过《对她说》的朋友都应该会对片中的那段默片印象深刻。这段对于默片的“引用”在我看来几乎就是神来之笔——这一前一后的两相对比，就像一面镜子直接照出了二者的不同。是的，在巴拉兹看来，无声电影和戏剧和有声电影其实属于不同种类的艺术；而无声电影和有声电影之间的差别，怕是要比古典音乐和摇滚之间的区别都还要大。而上述的论断也并非是我个人的臆断，因为在巴拉兹晚期的著作当中，他这样写到：书中对当时的实际情况做了至今依然正确的论述……因为我认为电影在当前的发展道路上，正需要把无声电影的一些已经一度获得但旋又丧失的优点重新估价并加以恢复，所以我要摘引我在 1923 年写下的一段关于无声片的文章。

巴拉兹对自己之前论述的坚持并非是对技术进步的一种抱残守缺，并且与他持同样观点的也还有爱森斯坦，卓别林这样的电影大师。事实上，声音的出现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造就了一批烂片。许多导演为了保证片中声音的真实完整性，而整个地放弃掉默片时期已发展得十分成熟的蒙太奇技术与镜头使用方面的技巧，从而使得影片在很多方面都出现了一种倒退。这几乎是从另一个侧面佐证了技术进步对于艺术所可能带来的负面效应。不过对于当下的我们而言，巴拉兹的意义却是在于让我们暂时抛开声音，顺着他的手指把目光都聚集在电影的视觉表现能力之上，从而获得一些平时被声音所遮蔽的洞见。而这样一种回溯与复古的思路，亦是为我个人所钟爱的。

在这片和谐的土地上，从五月起就有不少摇滚演出被取消或推迟了，为此我将不得不与 mando diao 擦肩。只是我没有想到的是，PK14 也会因为乐队成员受伤而中途折返，这大约是我在七月最为期待的一场演出了。PK14 从成立到现在，乐队成员换了一茬又一茬，而乐队本身也似乎刻意地把自己保持在一种不温不火的状态。有人说，要是把主唱换了，肯定早火了。这话不是平白无故的。主唱杨海崧那种支离破碎般的念白方式会让不少人感到不适应，而他在填词时对于韵脚的不在意更是加重了这样一种不适应。无论是从歌词还是演唱的层面，杨海崧似乎都在刻意地去打乱 PK14 音乐的旋律性。必须坦诚的是，那种由此而来的撕裂感却正是那令我着迷的 hook。不过，从采访中看来，杨海崧其实并非刻意为之，他在根本上坚持的还是音乐的一种诗性，是作为文字的歌词的诗性。有些字你一旦考虑韵脚，诗性就彻底不见了，他这样说到。是啊，如果不是诗人，又怎么会有人带着黑框眼镜在狭小的舞台以一种破碎的方式吼出：年轻的血呢？

PK14 的新专辑依然是这种诗性的延续。只是这一次，他们将注视更加精准地投向了城市生活，投向城市生活的每一个可能的细节。这一点无论从专辑名《城市天气的航行》还是具体到每一首的歌曲名都可以看出来。值得一提的是新专辑的封面几乎是算得上惊艳的。它本是出自鼓手朋友，一名加拿大摄影师的作品。远远看去就如同一只胖胖的鸭梨，也有些像一只五彩斑斓的青蛙。杨海崧说：他更喜欢前一个比喻。在我看来，很多时候唱片封面都是对内里音乐的一种隐喻，所以如果碰巧你也和我一样喜欢这个封面，那么在正式聆听之前不妨可以提前开始想象：在这样一个五彩斑斓又颇具凝固感的空间里，PK14 会引领一场怎样的航行。



常常都会有人说：上帝在关了一扇门的同时，也开了一扇窗。在和 PK14 擦肩之后，我倒也确实迎来了一些小小的惊喜。首先到来的便是白水。白水在 2005 年以民谣歌手的身份出道，但他在最初却是一支 doom metal 乐队的吉他手。这其中转向颇令人玩味。而当他把他的新民谣计划取名为 bloody woods 的时候，似乎也在向我们透露他个人身上 metal 与 folk 之间的隐秘链接。就在 2007 年 10 月，他发行了自己的个人专辑《时间》。这是一张限量版的唱片，所以等到后知后觉的我发觉之时，已然无处可觅得。从而，他的现场演绎对我来说，无疑是一种馈赠。

白水是充满魔力的。因为在遇见他之前，我从未想过有人可以如此贴切地将川南的民风民俗融入到当下的民谣当中。眼下的民谣不少都是沉郁忧伤，可是在白水那里你却可以听到那种诞生于乡村生活的雀跃与欢畅，仿佛你伸出手就可以触摸到那种生活朴素的质地，仿佛在旋律里就可以嗅到雨天青石板的味道。白水几乎是用音乐刻下了连时间都抹不去的关于故乡的回忆，关于那种生活的回忆。

紧随白水之后的，是一支名叫“仁老外”的德国三人组。只要是明眼人，大概都能看出他们根本没打算好好做一支乐队，所以连名字都起得如此随意。可是就是这样一支随意的乐队却在一个小时之内完完全全地征服了当时在场的所有人。

尽管他们穿着整齐的巴伐利亚传统服饰，可是一开场奏响的却是当代的实验音乐，在由提琴和手风琴进行了一段近乎喋喋不休的对话之后，小提琴的一声悠扬终于把旋律带入了我们熟悉的巴伐利亚；而也是从那一刻起有的人的心便开始围着火堆跳舞。就在我依然整个沉浸在巴伐利亚的氛围之中时，这支随意的乐队再度让我大跌眼镜，竟然开始奏起了东欧的民谣。面对着那些悠扬舒缓的旋律，我打赌要是我老爸在场也一定会喜欢的。然而，真正让我大跌眼镜的还是他们竟然就此一发不可收拾，开始大玩吉普赛音乐与拉丁风。尽管我不得不说，比起我听过的吉普赛摇滚他们还显得不够那么 rock&roll，可是当他们在最后的安可曲目奏起《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的时候，现场还是整个地被点燃了。并且，在他们的安可曲目中，并非只有莫斯科在战斗，红楼梦的主题曲和《大海啊，故乡》等等耳熟能详的歌曲都在这一刻灵魂附体。

还是乐队的风琴手 Paul 告诉我：他们的整个巡演其实就是旅行；而旅行的起因只是他们在德国的好友想来中国玩，于是便索性组了一支乐队边走边演，还可以补贴路费。至于回国后，他会继续把医科读完，当个医生什么的。你知道要靠音乐来生活是很难的。当他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彼此看了一眼，然后都笑了。是啊，无论国内国外，靠音乐来生活都是困难的；可是我们至少还能靠着音乐来一场城市间天气的航行，不是么？



阅读报告·台港海外

HONGKONG 香港

香港独立漫画 25 年

特约撰稿人 严飞（香港，fei.yan@green.oxon.org）

个人，独立，在众声喧哗的今日，越见难能可贵，保持凌厉尖锐目光，出手如灵巧针灸师的飞针，狠重如拳击手的左勾右勾，下盘坚稳皆因有立场有态度，框架内外连环天地宽，一笔一画一呼一应，都是美的实践。

——智海、欧阳应霁

香港是本土漫画的先锋，也是原创作品的重要产地。当大众耳熟能详的《中华英雄》、《风云》和《龙虎门》纷纷被拍成电影上映，这类可在报档买到的期刊式漫画，俨然已经成为了香港漫画的唯一指标。但事实上，虽然流行漫画是香港市场的主流，我们仍可见到很多本地独立的漫画制作，这本《路漫漫》，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切入的视角。



在这本书中，编者以时间为线索，走访了香港从上世纪 80 年代至今老、中、青三代共 27 位独立漫画人——这其中包括了老牌一点的，70 年代至 80 年代初香港最著名的漫画家荣念曾、马龙、一木，80 年代中期至 90 年代初开始创作的中生代如李志达、欧阳应霁、麦家碧、刘莉莉、林祥焜，以及自 90 年代中期以来涌现的如黎达达荣、智海、杨学德等新生代创作者。这 27 位风格迥异的香港本土漫画家，在书中各自讲述了自己的创作历程和发表经验，以及在市场元素和独立精神的冲突下，所秉持的对漫画理想之追求。可以说，每一个人，都是香港独立漫画 25 年历程的重要脚印。

纵观全书，将独立漫画放置于过去四分之一世纪香港漫画发展史的大背景之中，读者首先想要问的就是如何区别主流与独立之分。从受欢迎的角度出发，《风云》、《龙虎门》以及《麦兜故事》均被拍成电影，为何只有麦家碧被界定为独立漫画的一分子？主流与独立之间是否必然对立且矛盾？两者之间的分野，又如何在香港这个崇尚商业价值的社会中交织体现？

事实上,“独立”这个字眼在香港也是有时序的。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香港漫画界通常称呼一些比较偏锋的东西为“地下”,九十年代叫做“另类”,直到现在才改为“独立”。“地下”通常包含一些不那么容易被吸收,甚或是一些儿童不适宜的内容,而“另类”则比较讲究花俏噱头,“独立”则是近几年新兴流行起来的称呼,往往和跨媒介的创意工业相互联系,以求开发出更加新颖的多媒体创作空间。

主流与独立的最大区别,则是源于其中的生产模式。主流漫画很大程度上配合文化工业的运作,拥有自己的工业生产模式,有生产线,有发行机制和渠道,定期出版,即使作者去世了仍然会继续出版。而独立漫画家却乐于游离在文化工业的边缘上,他们的作品不仅不受大公司大财团影响,偏离商业化色彩,也不属于主流的风格类型,形式与题材上都比较奇怪一点,善于运用新方法去表达,富有实验性。因此,独立漫画更讲求创作者个人关注的题材,以及个人化的美学实践与价值判断,体现出漫画家强烈而独特的个人色彩。

在香港,独立漫画人一直遇到的问题,一是能否得到别人的认同,二是有没有出版社愿意出版。不过就此书所访问的漫画人看来,香港独立漫画所面临的真正困难,乃是香港这个资本社会对漫画过分注重商业化的束缚。

由于漫画在香港一直处于娱乐消遣的位置,未被视为正统文化的一部份,漫画的根底虽然久远,经历了从早期讽刺政治及草根社会状况到中期反应现代英雄或小市民风味的题材变化,但漫画界整体的创作氛围却无法摆脱急速浮躁、工具理性主导的社会大环境,所以到了后期都不可避免的被趋同并固化为古装、武打的单一模式。再加之香港人也大多习惯了快餐式的速读习惯和主流漫画风格,地铁、巴士上随处可见手捧武侠漫画的读者,这就好比香港的建筑美学,多年来只关注浮夸的设计和金碧辉煌的装饰,而缺乏必要的审美能力,从而使得香港独立漫画的力量更加显得小众且势微。

尽管如此,香港一班独立漫画家们依旧在默默耕耘,努力突破技巧和风格的束缚,以拓展独立漫画的空间。麦家碧说:“只有不停重复地画,我才感到幸福。”作为麦兜的“母亲”,她要不断保护麦兜免受不良商业元素的侵袭,怀着一颗对小朋友的温柔之心绘画;欧阳应霁认识到“香港的创作环境其实是挺好的,好在够混乱、够多事。”在这个烦躁不适合安身立命的地方,正是因为漫画家有所不满,有所触动,感到不屑和愤怒,才会觉得要争取对现世情感的观察和表达;Stella So“从旧居被拆开始”,她笔下的利东街、新光戏院、民园面家,都是在探讨和唤醒一些香港日常生活中快被遗失的碎片(她今年出版的新作《粉末都市》,更是用漫画形式表达香港本土风情的极致代表);杨学德深知自己“就是画不出英雄和美女”,于是将漫画作为自己的精神寄托,挖掘出一点一滴的社群情感关怀;阿高细心观察小市民的生活,梁以平淡化沉重的感觉,既要表达热爱,也享受创作;国志鸣以缓慢来沉淀累积,John Ho以宁静坚持纯粹的创作……

路漫漫,香港独立漫画 25 年的历程是个总结,但却不是个终结。作为香港社会文化的构成产物,它的未来发展方向,则还需如书中所言的那般:“不单只是看一个人的造化,而是要看群众的造化。”

智海、欧阳应霁编著:《路漫漫:香港独立漫画 25 年》,三联书店(香港),2006 年 7 月。

ENGLAND 英格兰

BBC 内部的“主义之争”

特约撰稿人 孙骁骥(英国·谢菲尔德, seismometer2006@yahoo.com.cn)

由于各种原因,新闻的公正性成了国内一时的热门话题,但我们对它的讨论还远远谈不上成熟。在“西方主义”思维的笼罩下,各大西方主流媒体纷纷被“爱国者”们拉下马来。而当媒体大众向道德制高点发起集团冲锋的时候,最后抢占下来的往往是极为孤立、虚幻的道德山头。勒庞在《乌合之众》中说过,“道德”这个概念实际上并不适用于群体,因为群体的“道德”总是受到各种暗示的诱导,“很容易慷慨就义,同样也很容易做出刽子手的举动”。这种易变性从传统的道德观看来,恰恰是一种不道德。

“不道德”的反面,一定是“道德的”吗?对此,BBC 的资深记者罗宾·艾特肯另有答案。在《我们能相信 BBC 吗?》一书中,艾特肯以多年前《广角镜》节目在教宗保罗二世的纪录片



中针对天主教徒反对堕胎的“借题发挥”为例，批评“自由主义者”们之所以将此事翻出来炒作，仅仅因为“这很方便地将读者区隔为自由主义或保守派”。新闻中的道德感，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个伪概念。在艾特肯看来，新闻的根本原则是让矛盾的双方都有发言权的“机会均等”原则。在与“自由主义”和“道德”划清界限之余，他还提出了两个观点：首先，新闻报道中打着“道德”幌子的偏见通常建立在一种自由主义和保守派的“二元论”的基础之上；并且，这种“二元论”很大程度上体现着当今英国媒体的政治格局，因此又是不可避免的。

作为英国公众最重要的喉舌，皇家授予 BBC 的特许证规定了它必须要在原则上避免对任何个人或组织的偏见，但实际 BBC 内部历来存在着自由主义和保守派“两条路线”的斗争。经过多年发展，BBC 由区区 3 个主要频道的广播公司扩展为下有 7 个国家级电台，39 个地方台的托拉斯企业，其下属机构遍布英伦三岛，与默多克收购的“天空电视台”相较，BBC 的电视市场份额近前者的八倍。但是，在《卫报》最近的一项调查中，59% 的人认为 BBC 新闻的可信度比以前下降，并且其以往较之其他媒体的公正性优势，已不复存在。

前几年还被人揶揄为“布莱尔广播公司”(Blair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的 BBC，2003 年却因为 BBC 第四电台的《今日》事件和对一系列皇室丑闻的报道而与工党政府和皇室交恶。由于 BBC “不服管束”，英国政府决定对其进行改革并发表了白皮书宣布成立监管组织 BBC 信托(BBC Trust)，以确保 BBC 不会在追求“自由主义的普世价值”这条路上走得过远。不过，整个组改的关键并未能触及 BBC 内部的“政治文化”，而正是这种“政治文化”，“事实上构成了不列颠的公共话语平台，潜移默化着我们的思想。”

自 1987 年颇受争议的节目制作人约翰·伯特入主 BBC 管理层开始，BBC 的主导思路便逐渐从“英国最混乱的公共设施”向更为专业化的新闻机构发展。早在 1975 年，伯特在为《泰晤士报》撰写的一篇文章中说：“电视新闻中确实存在着偏见的问题。它不是针对某个党派或观念——这是一种反对‘理解’的偏见。”伯特认为新闻的价值在于对事件的分析，向观众解释信息背后的“为什么”。并且，这样的解释“越多越好”。

抛开别的影响不说，伯特的编辑思路的一个直接后果是：BBC 传统中“不介入”的报道模式，在无形中被掺入了过多的编辑思路和个人意见。伯特留下的遗产除此之外，还有新拓展的 12 个电视频道、5 个国际频道和一个大型网络服务机构。可以说，伯特的本意是将 BBC 的新闻视点变得更多元化、更有趣，更具争议性，而且事实上他也将这一理念扩展到不断壮大的 BBC 分支机构中。不过，伯特的媒体哲学一旦融入了 BBC 内部复杂的“政治文化”，其结果就不仅仅像他预想的那样简单。

今天的 BBC 以“人权”和“左派价值观”的捍卫者自居，但有时候我们也会发现，类似的“捍卫”未免矫枉过正了一些。在 BBC 内部有约 70% 的工作人员支持工党，15% 左右支持苏格兰国家党，另有 15% 是所谓的自由派。由此，占苏格兰约三分之一人口的保守党人们自然而然地被 BBC 忽略掉了。作者曾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供职于 BBC 苏格兰部。其同僚们对保守主义和撒切尔的态度可谓如出一辙，“我们所选择的报道题材无非是工业的萧条、紧张的社会局势以及没有良心的保守党政府”。保守党的名声在苏格兰迅速被搞臭有各方面的原因，但不可否认，BBC 对撒切尔政府不知疲倦地描黑和“反乌托邦化”，无疑使苏格兰成为人们印象中政府改革失败的牺牲品。而在北爱尔兰问题上，自撒切尔夫人在 1985 年明令禁止英国的各大新闻机构对爱尔兰共和军之类的“恐怖组织”进行报道，北爱共和军便多次策划刺杀英首相，但 BBC 似乎仍然对独派的新芬党保留了最大限度的同情。

如果 BBC 笃信所谓的普世价值，那么它至少应该在英国政党政治中保持中立，其目的是为了保证新闻的公正性。但显然 BBC 在实践中并没有完全履行这一原则。例如，在 1999 年的科索沃战争和 2003 年的伊拉克战争中，BBC 的报道就具有明显的偏向性。在美英政府走得最近的克林顿时期，工党政府支持的科索沃战争基本上得到了媒体的正面报道；然而，四年以后的伊拉克战争则因 BBC 对布什中东政策的不满而受到了彻底的批判。艾特肯曾质询 BBC 政治部主任菲尔·哈定，说来自工党和保守党的人员数量的差距会影响报道的客观性和组织内部的平衡。不过，哈定对 BBC 人员与政府过从甚密的情况感到“没什么影响”，他本身就是一名坚定的工党支持者。

2003 年 7 月，《今日》节目引述了一名政府官员的话称布莱尔政府在萨达姆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问题上“加油添醋”，而没有按照情报机构所提供的情报准确向公众报告，以获得公众对参与美伊战争的支持。对有关英国首相府是否涉及“夸大”伊拉克可以在 45 分钟内，激活具大杀伤性武器的新闻的 BBC 著名记者安德鲁·吉利根后来在一篇文章中称，布莱尔政府的新闻官阿斯戴尔·坎贝尔是夸大情报的幕后黑手。在原先怀疑是 BBC 情报来源的英国国防部专家大卫·凯利博士自杀后，事件继续恶化，BBC 和英国政府都被指责“毫无道德地”欺骗了大众，应对凯利之死负责。在独立检察官最后发表的《赫

顿报告》中，吉利根和 BBC 高层都被指责对新闻处理不当。事件导致吉利根本人、BBC 总裁和理事会主席的辞职。

作为英国最为知名的电视节目，《今日》对英国公共话语空间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正因如此，事后《泰晤士报》、《每日电讯报》、《太阳报》等纸媒对 BBC 高层大加挞伐。《太阳报》透露说，《赫顿报告》揭露 BBC “草率、自大及没有竞争力”的积弊。此外，要求 BBC 从内部文化到行政编采系统进行改革的声音也相当高，激进者甚至提出，鉴于 BBC 没有遵守新闻的公平原则、无法取信于众，整个机构应该进行私有化改革。对于艾特肯来说，这无异于“自由主义”在 BBC 内部最为过火的一次表演，而他自己也在那个多事之秋选择了离开。

波德里亚曾经假设过，即使海湾战争并没有发生，但通过全球媒体铺天盖地的报道和轮番的信息轰炸，也可以在观众的头脑中“构建”出一场海湾战争。话虽夸张，从中也可见当今媒体对人心智影响之大，竟然可生生虚构出一个“现实”来。而作为媒体的执掌者，其自身固有的意识形态对受众的影响，怎么估计也不为过。当然，作为五十年代“婴儿潮”出生，在七十年代电视节目影响力急速扩张时期成长起来的一代媒体人，BBC 的高层们不可避免地被打上了时代的烙印。个人主义、物质至上、挑战现行权威是这代人的共同特点。问题是，当一个具有如此影响力的新闻机构开始有意识地排除所有自己所不喜欢的声音时，它就成了对公众舆论健康的潜在威胁。

六月的《展望》杂志有一篇评论认为，新工党目前的执政危机并不单纯地因为政党内部的“左右之争”，其本质在于自由主义和官僚主义思想的权利角力。作为一个执政十一年的政党，工党标榜的自由主义路线如今已演变为一张单薄的政治牌而已。而 BBC 作为工党政治气候的晴雨表，其新闻报道的思路多少也折射出英国政治的格局与走向。所谓“两条路线”的斗争，本质上并非什么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之争，而是自由主义由于被滥用而产生出的“为自由而自由”的极左思潮与新闻“平衡原则”价值的争论。BBC “主义”之争所反映出的，是最为实际的“问题”。

Robin Aitken : *Can we trust the BBC?* (Paperback), Continuum, Feb 2008.

追念·索尔仁尼琴

我们依然需要重温索尔仁尼琴

观察员 王晓渔（上海，wxy1978@hotmail.com）

正在睡觉，收到朋友的短信：索尔仁尼琴去世。就像听到柏杨去世的消息，我有些意外，但没有太多悲痛，两人都得享天年，年近 90 而去，按照中国的说法，属于“喜丧”。更重要的是。他们死得其时。如果在 20 年前去世，索尔仁尼琴将无法看到“癌病房”的倒塌；如果在 10 年前去世，他又会对摧毁“癌病房”的休克疗法含恨终生。1990 年，索尔仁尼琴拒绝了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授予《古拉格群岛》的国家奖；1998 年，索尔仁尼琴拒绝了叶利钦颁发的俄罗斯联邦最高国家奖；2007 年，他欣然接受了普京颁发的文化教育领域杰出贡献国家奖。



按照惯例，喜爱的作家去世，我总会把他的著作找出重读，以这种方式进行“遗体告别”。“遗体告别”是一种追思，不等于告别逝者的写作和思想。在中国，不乏对索尔仁尼琴的称赞，但对他的批评也不少，主要有两种，一种认为他的作品缺乏艺术价值，属于“伤痕文学”；另一种认为他的思想已经不合时宜，属于“冷战思维”。在我看来，索尔仁尼琴恰恰是在以“见证写作”对抗“伤痕文学”、以“人道主义”对抗“冷战思维”。在一个现实比文学更有想象力的国家，“见证写作”是文学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这不仅是一个作家之为作家的承担，也是人之为人的承担。维护人性的底线在任何时代都是需要的，与冷战没有必然关系。索尔仁尼琴的作品不仅呈现了个体如何失去自由的过程，也呈现了高压政治对个体造成的精神内伤，与其说他讨论的是政治，不如说他关注的是人性，人性之恶如何被政治之恶唤起。

不久前，我曾把索尔仁尼琴自传《牛犊顶橡树》找出，重温他笔下的地下工作者生活。索尔仁尼琴笔下的“地下工作者”指那些拒绝按照既定程序写作的作家，他最初曾经坚信有几十个“秘密写作的兄弟”分散在各地，后来发现自己低估了契卡的能力，敬业的契卡可以将天才消灭于无形之中。索尔仁尼琴

不是把地上和地下对立或者隔绝起来，而是写出了两者相互遭遇的情形，写出了介于两者之间的暧昧地带，这正是冷战思维无法触及的区域。他如此评价《新世界》总编辑特瓦尔多夫斯基的作品：“没有说出战争中所有全部真理的自由，然而他在距离一切谎言只有一毫米的地方停下了脚步，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跨越这最后的一毫米，绝对没有！”同时，他又指出编辑们除了迎合总编辑，没有其他目的，“有朝一日文学史将惊奇地研究和了解到苏联的这家热爱自由的、最富有自由主义思想的杂志编辑部，在痛骂斯大林个人迷信的这些年代里，在自己的内部仍然奉行着个人迷信的原则。”索尔仁尼琴认为这不是特瓦尔多夫斯基制造的，这是“癌病房”的传染病，但他也没有为刊发自己成名作《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的总编辑作无罪辩护，而是指出：“特瓦尔多夫斯基缺乏朴素精神和幽默感来发现这些并给予制止。”这种贴身观察不太可能出自敌人，敌人很难理解敌人，这名地下工作者不是来自敌营，而是来自自己的阵营。

为索尔仁尼琴辩护，并不等于拒绝对他进行批评。我承认索尔仁尼琴的艺术价值要弱于另外两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帕斯捷尔纳克、布罗茨基，我也不否认索尔仁尼琴具有一定的冷战思维。索尔仁尼琴的冷战思维不是表现为他站在敌对势力（美国）的立场上恶毒攻击伟大祖国（苏联），而是他依然无法摆脱斯拉夫主义的幻想，同时又对西方缺乏足够的了解。30年前，索尔仁尼琴在哈佛大学演讲，对西方社会进行了激烈批判，可惜这种批判远不如他对“癌病房”的批判准确，此时他不再从地下工作者的视角进行观察，而是把西方当成假想敌。这充分说明要自古拉格群岛走出来，有多么困难。

幸运的是，索尔仁尼琴不是李敖，没有从英雄演变为小丑。直至今日，我们依然需要重温索尔仁尼琴。当古拉格群岛和“癌病房”存在的时候，我们需要重温，让它们在我们的内心慢慢坍塌；当古拉格群岛和“癌病房”成为历史的时候，我们依然需要重温，让它们不再重新成为我们的未来蓝图。

书评·文化

裸奔是最古老的奥运项目

特约撰稿人 汪伟（上海，2005wangwei@gmail.com）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奥运会主办国都要挖空思想出一句铿锵有力的口号，这应该是大众传媒恶劣应用的例子之一。这些口号的共同特征是空洞。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的口号是 Play part in the history，四年后汉城奥运会的口号是 Harmony and progress（翻译成汉语就是和谐与进步，亚洲国家希望通过经济进步达到政治和谐的思路，并不是最近才有的），这些励志但往往不知所云的美丽言辞是语言的灾难，除了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the celebration of the century）和2004年雅典奥运会的口号（welcome to home）略具叙事性，其他口号比如2000年悉尼奥运会的 share the spirit，都是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大帽子，换了用来作为联合国大会的口号也无不可。

北京奥运会的口号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照我的理解，人类都生活在同一个世界上，肯定有一些梦想是相同的，比如吃饱穿暖性生活和谐等等，本来用不着特意去强调。而有一些梦想目前是有地域性的，比如要生活得体和有尊严，对很多文明世界的人们来说，这和空气与水一样是不证自明而且不可或缺的生存的前提，但对另一些地方的人们来说，体面和尊严的生活极度稀缺，仍然是梦想——在梦里才能想一想。如果北京奥运会的口号里说的是这样一些梦想——换一种流行说法，就是所谓“普世价值”——并且认为它们值得借着奥运会来推广一下的话，那倒也不错；可惜事实远远不止这样。奥运会素来不许裸奔，北京奥运会索性连条幅和小喇叭也禁止了，这出乎我的意料，再次让我感到人们尽管在同一个世界上生活，但梦想却完全不同。

关于裸奔这档子事，我是这样理解的：很多人喜欢或者觉得有义务表达自己对世界的看法，为了吸引别人的注意力，他们不断革新表达的方式，使得观点表达的过程充满娱乐色彩；裸奔就是其中的一种。

既然是意见表达，自然要奔着人多的地方去。包括奥运会在内的大型户外体育活动最受裸奔者的亲睐。这让安保工作变得有点无奈，某种程度上还造成了更加严重的后果。不久前结束的欧锦赛决赛上，好多中国球迷冒着被老婆和领导骂的危险熬夜看球，转播却中断了好长时间，等到电视画面恢复的时候，西班牙和德国已经各自攻进了一球。赛后官方解释说是天气

原因导致转播中断,但全球只有中国的转播出现了中断,这样神奇的解释很难被球迷接受。到后来,地球人都知道,中断转播的真正原因是赛场上发生了裸奔。

裸奔是一种意见表达,和在电视镜头前打出大幅标语一样,只是一种言论,理应受到言论自由原则的保护。实际上,裸奔和条幅在体育赛中频频出现,大家都已经见怪不怪:我当然地觉得,这种言论表达已经成了现代体育运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肯定有人要急忙反对说,这是把奥运政治化——听他们的口气,好像政治是什么见不得人的脏东西,只能在桌子低下私相授受,决不能拿到奥运会这样高级别的台面上来——这样的政治是有的,而且多的是,难怪他们会这样以为。但政治并不都是这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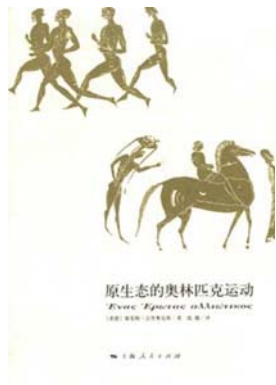
在古代希腊,体育竞技、哲学辩论和政治活动都是在运动场进行的。古希腊人相信,有健康的身体,聪明的头脑,并且参与公共事务的讨论,人生才有幸福可言。这有吴于廑先生最近重版的著作《古代的希腊和罗马》为证。

吴先生是有名的世界史学者。1935年毕业于东吴大学,与何炳棣等人同期考上赴美留学公费,1946年在哈佛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次年回国任教于武汉大学。他在哈佛学的不是世界史,因为阴差阳错的原因,才成了1949年后寥寥不多的世界史学者之一。

中国大学里教授的世界史是没有中国的世界史,这件古怪的事情一直让我感到不可思议,认为自己生活在一个奇妙的国家。照我一点粗浅的看法,世界史应该是种族和国家之上的人类历史,其主干是文明史——吴于廑先生有一本著作题为《从分散到整体的世界史》,看法与此庶几类似。只有从人类和文明的角度出发,这个世界上才有所谓“普世”和“普适”的事物。有人认为“中国特色”是最了不起的发明,因此否认有“普世”和“普适”的文明准则存在,我认为正是这种没有中国的世界史教育必然会产生产生的结果。

《古代的希腊和罗马》是本小书,特点是写得很抒情。“在克里特考古学上,克诺萨斯新宫被称为第二宫。现在让我们根据第二宫遗址的情形,假想它的完好一如当日,而我们自己则是因风吹去的游人,到宫里去观光其中的一切”,这样的字句,不禁让我想起顾准推究希腊城邦制度的往事。考虑到《古代的希腊和罗马》初版是在1957年,我相信,这不仅仅是一个历史学家在抒发怀古之幽情。

生在雅典繁荣时期的希腊是许多现代人的梦想,而且并不只是革命时代的中国人才作此想。希腊医生塞莫斯·古里奥尼崇拜古代奥林匹克体育,将许多现代奥运项目斥为狡诈取胜的游戏,他推心置腹地说,世界上只有希腊语和汉语将“体育”和“娱乐”做了严格的区分。对古里奥尼的美意,我个人感到很惭愧,所以更加理解那些希望生在古希腊的人。和古代希腊人相比,我们不仅身体羸弱,精神更加猥琐,语言也已经失去了原有的纯净。我们居然把政治作为奥运会的反义词:这是发源于希腊的奥运精神的退化,更加是发源于希腊的民主政治已经衰亡的象征。



最早提出奥运应该和政治分家的是曾任国际奥委会主席达20年之久的美国人布伦戴奇。1933年,一些著名的犹太运动员被德国的体育组织排除在外,丧失了参加奥运会的权利,这引起许多国家的奥委会的警觉,他们宣布可能要抵制1936年在柏林举行的奥运会。布伦戴奇当时是美国奥委会主席,他反对抵制德国,理由就是——请注意看清楚——“政治不应介入奥运”。

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大概是迄今为止最政治化的奥运会,但在一本小册子里,布伦戴奇要求美国运动员避免介入“犹太与纳粹的口角”,他说,“奥运会属于运动员而非政客”。逻辑学得不好的人肯定已经被布伦戴奇绕晕了。但对兼善逻辑和体育的古代希腊人来说,这种默认纳粹搞政治迫害却不允许运动员进行政治抵抗的说辞,只是修辞上的一种小把戏,很难避免被人鄙视的命运。可惜的是,什么风也不能把我们吹到希腊,更不要说是古希腊了。所以,现在反对把奥运和政治联系起来的地方着实不少,而且,越是否定奥运与政治有关系的地方,真正的奥运精神和民主政治意识就越衰微,就越是反对裸奔。

古代奥运会的选手都是全裸出赛,这当然不是奥运会今不如昔的主要原因,我要说的是,这很有可能是今天我们选择裸奔的历史源泉所在。据说第一届奥运会只有200米跑这一个项目——也就是说,裸奔是最古老的奥运项目,如今却当作一种政治行为被现代奥运会禁止了,这简直是一个悲剧。其实,裸奔表达的并不一定是政治意见,条幅不一定变成“反标”——



——也许恰恰相反，有创意的中国年轻人会写上“中国加油”、“胡温你好”一类——但只要有人认为“反标”这种东西真的存在，所有的条幅和裸奔就一定会被禁绝掉。用古希腊人的说法，逻辑使然。

今天的奥运会已经与理性、民主的希腊精神无关，而变成了一个娱乐的盛会（真是古里奥尼斯的不幸）。但即便如此，我仍然觉得，即便今后奥运会办成一个大 Party，完全以娱乐为目的，也应该对来宾怀有大度宽容之心，允许他们表达对 Party 本身乃至 Party 之外的事情的看法。我老家有民谚说，人上一百，样样不缺，符合我们对概率和人性的认知。既然奥运会意味着数以万计的临时人口在短期内涌入某个国家，他们必定有不同的性格、看法和行事方式，其中自然有人乐于或者惯于表达对奥运和奥运之外的事情的看法。这些表达通常分为肢体（裸奔）和语言（条幅）两种，但无论肢体还是语言，都属于言论的范围，应该宽容他们的存在，允许他们表达。

具体到中国，我对此是颇为悲观的。我国虽以好客自诩，但向来是“朋友来了有美酒，豺狼来了有刀枪”——那些既不是朋友，又不是豺狼，纯粹来瞧个热闹的好事之徒，我们也可以抱着 business is business 的实用心态，大赚其钱，但对于那些一心到北京来裸奔一番以明志的人，该怎么对待他们呢？也许我们还没有学会。

吴于廑：《古代的希腊和罗马》，北京三联，2008 年 5 月。

【希腊】塞莫斯·古里奥尼斯：《原生态的奥林匹克运动》，沈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年 4 月。

书评·文学

苏联的文学 G 点

“独立阅读”网友 张无极

将近十年前，我读到了布罗茨基，并且写下了一篇短文《布罗茨基的意义》。在这个短文里我主要讲述《小于一》带给我的震撼。请让我来引用我当时的描述：“在我所目睹的有限的中国选本中，它是散文的面目出现的，其实，我倒宁愿称这部作品为一部简约的社会主义生活史和精神诗篇。”

我甚至觉得当时的布罗茨基对于我的意义不亚于鲁迅，沈从文等人，仅仅就是这篇《小于一》。在我的个人阅读史上，一个单篇小篇幅（区别于长篇）作品引起震撼感的除此之外还有马尔克斯的《一件事先张扬的杀人案》，沈从文《边城》，汪曾祺的《小娘》，还有废名的《桥》。

准确的说，早从十年前布罗茨基引起了我的阅读和探究的兴趣。于是，我开始读到布罗茨基的《文明的孩子》。在那本书的封二位置上我见到了布罗茨基，“这是一张典型的犹太人的脸。他的眼睛被他的睫毛遮盖而小了，那里有一丝温情的眼神将你注视。他的额头宽广，智光一片。他的微微下坠的嘴角，（这里呈现出一丝刻薄，拥有智慧的傲慢，）和颊线以及他的微微上迎的下巴，（这里凝聚了他自恃自重的怀疑和嘲讽力）共同铸成了一个他的真实面孔，他的坚决，他的哀伤。这是一个持不同政见的面孔。”

后来我一直想读到他的《从彼得堡到斯德哥尔摩》，但始终无法如愿。因此我只是通过各种渠道零散的读到，只读到他的少数的几首诗，如《致乌拉尼娅》，《哀诗》，《我只不过是这样一个人》，《明代书简》，他的诗歌中的理性色彩，以及音乐，还有独特的隐喻力和浓郁的抒情意象，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那个时候我就在想，布罗茨基的文学和政治之间是否可以有一个制衡点，他们有效的互补互助而产生影响与功效？譬如象中国的艾青、老舍。这个问题的答案到我现在读到《布罗茨基谈话录》彻底的解决了。这本书的答案告诉我：对于布罗茨基，他永远不会让自己的文学苟活在一种政治逻辑里。他认为无视文学的尊则而生活是一种卑琐、无价值的生活。这让我自然联想起了老北岛。

由于这些的不存在与不可能，因此我读到他和叶甫图申科的交锋，不由哑然失笑：极富戏剧性。叶甫图申科在布罗茨基看来一钱不值。因为他们的价值观是不一样的。在这本厚达三百二十页的谈话录中，布罗茨基和他的学生所罗门沃尔科夫谈到了他如何被当局盯梢以致别逐出境。他的冷静和机智，以及那番“大粪”的言谈，使我进步引证这的确是我想象的布罗茨



基。这样的举动和话语是布罗茨基式的。

这时，我的脑海里浮现出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这个年轻诗人的身影，他在俄罗斯大地上流浪。在那个时代里，所有人都热心生产与建设。就是他，他没有工作。没有工作可意味着堕落。果然，人们的眼里容不得这颗游手好闲的沙子。很快，也就是 1964 年，苏维埃俄国以寄生虫罪将诗人逮捕了起来。并判处 5 年劳改，地点是在苏联的北疆。“在广袤的俄罗斯大地上流浪的权力被取消。纯洁的苏联的众生合唱中有了个不合谐音，1972 年他被清出了社会主义花房，前往西方。他成为一名流亡诗人。一个更加视诗高于一切的诗人。”

布罗茨基到达美国后的生活在这本书里所述甚少，但是可以肯定地是，按照布氏本人的话，他的肉体和精神都没有被制度摧毁。即便如此，它的强大和强迫性依旧存在。美国弗罗斯特和阿赫玛托娃的会见充分的证实了这点，当弗罗斯特问道：夫人，你怎样利用自己地段上的树木呢？我，比方说，用自己的树生产铅笔。而阿赫玛托娃脱口而出：如果我看到自己地段上的一棵树，我得赔国家六千卢布。顺便说一下，当初两位诗人会见的地点也是当局特意安排在一个相对富丽的别墅楼，而不是阿赫玛托娃的家，那个局促的“小亭子”。

我在此引述的两位诗人会面场景的意图只能以一挂万，事实上，我为这篇短文所起的题目也寓意于此：它只是不可言说只可意会的说明，布罗茨基他从 1972 年 6 月 4 日飞离列宁格勒就开始坚定的把握住了自己，或者这么说，他清楚地知道苏联的文学 G 点在那儿。

这本书分为十二个章节，与其说是一本谈话录还不如说是一本布罗茨基传记。他从时间上梳理和明晰了：布罗茨基如何成为了布罗茨基。这中间涉及到了茨维塔耶娃、弗罗斯特、阿赫玛托娃、叶甫图申科以及有一张“地图”脸孔的奥登，还有更多的人与事，是这摄影师的儿子成为一个 1987 年诺奖的获得者，其中涉及到每一件事情，每一个人物，每一个细节都不可或缺。

当然，这完全可以看作是一本诗学教科书，每一个立志为诗人的年轻人都应该读它。

【美】布罗茨基、沃尔科夫：《布罗茨基谈话录》，马海甸、刘文飞、陈方编译，东方出版社，2008 年 4 月。

书评·文学

承担一小块土地

观察员 戴新伟（广州，yukon1944@yahoo.com.cn）

孚克·米谢尔斯是德国 Suhrkamp/Insel 出版社的编辑，他编选的《园圃之乐》系黑塞跟园艺有关的随笔和诗歌合辑。在后记里，这位知名的黑塞专家回顾了 1958 年德国的《明镜周刊》所做的“误读”报道：刻意将黑塞打扮成享受着园艺乐趣的卑微老农。米谢尔说：

作家一旦醉心于大自然，或因致力于畝亩而符合狭隘保守的典型，很自然就被人们视为因思想落伍而百无一用的书生，或是逃避现实生活挑战的懦夫——从此以后，他们的一切作品只要和这个成见的框框相抵触，就会遭到人们排斥。（后记，P206—207）

九岁时黑塞拥有了一小块园地，后来醉心园艺，固然跟他自小的爱好有关，但更应体察他的生活经历：两次不幸的婚姻，尤其是在一战时夫妻俩双双接受精神治疗。自 1919 年开始，黑塞住在了堤契诺，过上了隐居生活。他当然非常享受在瑞士边境的宁静，在诗文里给人一种“奔波这么久，终于可以松一口气”的感觉。然而对于以美国为代表的现代文明的浸染，黑塞表示出极大的忧虑，老是唱反调。他生活在世外桃源吗？他却一再抱怨，堤契诺已经是柏林的卫星城了！在他的散文、诗歌和画作里，这种不和谐也是存在的：

连你也是美丽的，绿谷中的工厂



尽管你象征令人痛恨的事物及故乡
追逐金钱、奴役、暗无天日的囚禁

《为谷中工厂作画》这首诗最能体现他无奈的喜悦。

这两本书都自台湾“舶来”，《堤契诺之歌》有一篇米谢尔的前言《生命当如是》，介绍这一时期的黑塞，却不如《园圃之乐》的后记来得爽利。米谢尔担心黑塞的“老农”形象深植德国读者的心中，反而埋没了他在堤契诺时期所写的大量政治评论。不过，半个多世纪之后再看这些文章，黑塞的园艺作品早已摆脱了道德控诉，更有意思的是，我们今天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注意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卫星城与旅游团今天读者早已见惯不惊，因为现代病远较黑塞那时沉重，“承担一小块土地”，回归大自然也不再是受人诟病的姿态，更多地成为了都市大众的渴望。前不久读到的一本植物观察笔记《看草》（何频著，河南文艺出版社，2008年4月），记录了一位花草爱好者长达两年的日记，其中不少是一位文化人的日常生活内容，按中国人的看法未尝不是吃饱饭之后的趣味之作，但只要读一读他记载的花花草草，比较它们挪动的位置与生死的时间，不由就会关心起天气来。

对今天的人而言，天气都是大家的，尤其是要在吃饱了饭之后，才能承担一小块土地的命运。

【德】黑塞：《园圃之乐》，陈明哲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1月；《堤契诺之歌》，窦维仪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年1月。

何频：《看草》，河南文艺出版社，2008年4月。

书评·政治

现代化、民粹主义与官僚威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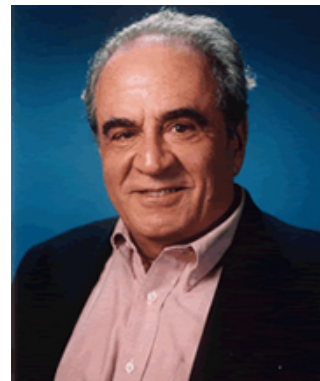
特约撰稿人 羽良（北京，priestliu@gmail.com）

曾有评论说，战后阿根廷的政治参与者只有两个半“庇隆主义、喜欢干政的军队和没有主心骨的反庇隆主义联盟”。而阿根廷如钟摆一样的“从投票选举到军队政变”的反复，也引起了理论界的广泛关注。作为南美洲经济最发达、现代化程度也最高的国家，阿根廷的民主制度在战后没有走向巩固，反而屡屡被军队政变所打断，以至于军队干政成为阿根廷政治最鲜明的特征。几乎所有的政治参与者都对民主报以“不忠诚的反对”，阿根廷（还有巴西）推翻了人们对现代化与民主之间关系的经验性观察。

最早致力于解释阿根廷现象的学者，是生于阿根廷的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吉列尔莫·奥当奈（Guillermo O'Donnell）。与其兄弟帕科·奥当奈（Pacho O'Donnell）留在阿根廷国内坚持从事文学创作和政治实践的选择不同，吉列尔莫在1966年阿根廷翁加尼亚军政变两年后，选择前往美国留学。1971年，奥当奈完成了在耶鲁大学政治系的三年研究生学业。他的学位论文《现代化和官僚威权主义：南美政治研究》成为解读阿根廷乃至整个南美战后政治发展的奠基之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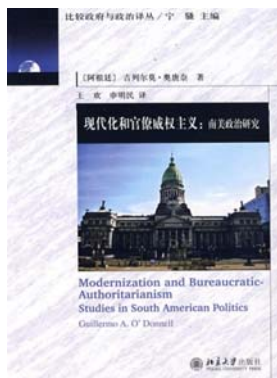
在奥当奈之前，美国的政治社会学家李普塞特（S.M.Lipset）曾对现代化与民主问题做出过重要的论述。李普塞特所做的论述往往被后来者描述为“现代化程度越高，走向民主的可能性越高”。但这并非李普塞特的本意。事实上，李普塞特只是将自己的研究定位为探讨用来支持民主政治系统的社会条件，同时，他也注意到了南美国家的反常情况。

在李普塞特的研究基础之上，奥当奈对阿根廷和其他主要南美国家的现代化过程和结构作出了更细致的分析。阿根廷的现代化发展极不均衡，大城市依靠贸易、外国投资和对内陆市场的巨大优势迅速建立起的现代化并没有惠及全国。经济上的进口替代政策为日后的政治危机埋下了深重的伏笔。进口替代政策满足了国内企业家实行重商主义的政治压力，国内企业得以通过初级的简单产品迅速在国内市场获得优势地位，随着工人阶级的壮大，国内市场的消费反过来继续拉动内需。但进口替代政策所能带来的繁荣和谐却面临着两个严重的长期问题：一是对技术产品和资本品进口的依赖，和由此产生的外汇需求。



二是国内的资本和技术优势高度集中于少数国内资本寡头手中。

进口替代政策显著的影响了国内的收入分配。工人阶级的迅速发展,使得工会力量高涨。同时,国内消费的繁荣给工人和本国企业家阶层带来了较高的收入水平。这为民粹政治家提供了良好的生存环境。深受国家社会主义影响的庇隆上校提出的所谓“第三条道路”,使得工人阶级和中小企业主成为庇隆的坚定支持者。但是,能够令进口替代政策持续有效的基础,并不是支持庇隆的工人阶级,而能够带来外汇收入的国内寡头资本家和国外投资者,这些人却大多站在反庇隆主义政党的阵营中。



奥当奈发现,尽管庇隆掌握着更多的选票,但他的对手却掌握着更多的资源。广受爱戴的艾薇塔·庇隆(即大名鼎鼎的庇隆夫人)凭借自己超凡的女性政治魅力帮助庇隆稳固了工会的支持,同时更是通过争取妇女选举权而帮庇隆拿到了一个新的大票仓。但这只是强化庇隆的民粹政治家底色,却无助于弥合深刻的社会分裂。随着阿根廷的出口经济受国际市场波动的影响大幅度下降,外汇短缺以至于技术和资本品的进口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同时,初级产品在国内消费市场的增长遇到了难以突破的瓶颈,内外因素催生了阿根廷的战后经济危机。

外汇短缺和内部市场增长停滞导致进口替代政策的全面失效。但此时,庇隆为了继续赢得工会和社会中下层支持者,不得不坚持有利于工人阶级和底层民众的收入分配政策,收入分配变成了零和博弈。这极大的损害了国内企业寡头的利益。

当庇隆在1955年被军队政变驱逐下台后,军队将政权移交给反庇隆主义政党,但他们也并没有实现更好的执政业绩。在1966年翁加尼亚军政变之前,阿根廷政府在动荡的经济危机中反复摇摆自己的经济政策,在位的总统要么要讨好庇隆派的选民,要么必须面对军队和国内寡头集团的威胁压力,国内收入水平停滞不前,但收入分配的零和博弈游戏却几经变化,当有一个阶层得利时,几乎必定有其他的阶层真实收入受到严重侵蚀。奥当奈指出,不均衡现代化的阿根廷在公民权利方面同样不均衡。当反庇隆主义政党联盟和军队意识到庇隆主义政党在选票上的巨大优势时,他们做出的反应是关闭庇隆主义政党的参政渠道,硬生生的剥夺庇隆支持者的选举权,以达到选举获胜的目的。“民主”,也在这样的选举操弄下变了味儿,成为一个不值得信赖的名词。

摇摆不定的政策,频繁更迭的政府以及民粹思想泛滥所带来的群众普力夺主义,激活了一个新的政治群体:即随着阿根廷现代化进程而出现的技术官僚群体。在奥当奈的分析中,技术官僚随着现代化和社会分化的深入,不断渗透进整个阿根廷社会网络之中。技术官僚往往受过良好的专业教育,同时,他们更注重效率导向的政绩评价,而不太看中衡量全面的政治进步指标。技术官僚群体所普遍带有的“角色模仿”特征,成为他们按照“专业视角”改造社会的政治驱动力。奥当奈的这个观察颇耐人寻味,令人很难不联想到今天中国社会声誉颇佳的“技术官僚”和很多人期待的“专家治国”论调。很多人天真的以为技术官僚代表“非政治化,高效,高素质和低腐败”,事实上,在一个非民主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技术官僚们对政治和公民权利的理解往往偏激的令人发指。他们几乎天然的厌恶“缺乏效率”的选举和社会运动,是威权政治,也曾经是极权政治天然的爱好者。

奥当奈敏锐的从1966年政变军人身上,看到了技术官僚群体僭越民意的本质。如同翁加尼亚将军在就任陆军元帅时所作的“军队非政治化”宣言中暧昧的措辞所指向的那样,作为技术官僚的职业军人在阿根廷的“非政治化”实质上只是通过这一姿态,换取军队保持其独立的政治思考和政治干预权力的修辞,也是其在“军队认为应该的时候”进行自我授权的合法性来源。而当这样的“非政治化”军队以保卫共和国宪法的名义进行政变时,它的“高效、高素质和低腐败”组织形象,赢得了市民社会的广泛支持至少是默认,军队竟然被认为是拯救国家的最后一支可靠力量。

这样一支军队,连同其他追求“效率”的技术官僚群体,已经不再为交接政权设置时间表。他们认为必然会赢得选举的庇隆主义政党是社会冲突的根源,而反庇隆主义政党则缺乏执行有效政策的能力,而且几乎不可能从前者手中赢得选举。于是,一个反民主的官僚威权就这样仅仅通过自我授权获取了权力。

奥当奈的研究指出了民粹政治的危险。民粹政治可以在短时间内激活数目庞大的政治群体,但在政治参与空间狭小的情况下,在位者必须不断的通过政策讨好被激活的群体以保持支持率。这势必造成政策上的机会主义。另一方面,反民粹的寡头集团掌握着更多政治、经济方面的资源,可以轻易的破坏现行规则以关闭支持民粹阶层的政治参与通道。换句话说,寡头集团的政治权利在与平民群体的政治权利相较量时,总是取得不对等的胜利,从而深深危害平等的民主原则。最终,当冲突各方意识到这种零和博弈不可持续时,形式上的民主制度就面临着崩溃,“富于效率”的官僚威权政治反而成为“呼之欲出”

的共识。

后发国家的现代化，有着天生的“移植”因素和模仿偏好。然而，由于社会结构和现代化进程的巨大差异，后发国家的政治发展路径并不会朝着一个固定的方向推进。现代化可以巩固民主，同样也可以催生威权、巩固威权。在这个意义上，对现代化与民主关系的误解，也许只是“电气化共产主义”在冷战之后的世界中一个新的翻版。

【阿根廷】吉列尔莫·奥唐奈：《现代化和官僚威权主义：南美政治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年 6 月。

温故

藏在旧书店的大师傅

观察员 戴新伟（广州，yukon1944@yahoo.com.cn）

正如旅居墨西哥的 33 岁小说家马尔克斯遇到了《佩德罗·巴拉莫》的作者胡安·鲁尔福之后大放光彩（老马云：“对于胡安·鲁尔福作品的深入了解，终于使我找到了为继续写我的书而寻找的道路”），某个领域的杰出人物总有一个看起来不那么杰出/著名的心仪对象，后者或者至关重要地启发了前者，如鲁尔福之于马尔克斯，或者做出的某些成就一直为前者所尊敬，如陈荣之于蔡澜。

前不久在旧书店里遇上一套《入厨三十年》，14 本，香港陈湘记书局 1985 年再版，作者陈荣（闻所未闻），看封底的预告，除了这套书之外，他还有《中国点心》、《家庭食谱》、《汉饌大全》、《烹饪指南》、《饮食经》等著作。外事不决问 google，发现他资料极少，毫无生平，却意外地搜到了蔡澜在 2007 年 8 月 11 日《明报》的专栏《好文》，写的正是陈荣这套《入厨三十年》。

蔡澜写道，“一直在找陈荣先生的旧稿，他那年代吃的东西，是无法尝到的，但至少可以读读，才知道我们失去的实在太多”。有朋友送了他四册本的《入厨三十年》，他高兴坏了，陈荣师傅的饮食文章好在哪里呢？除了他是粤菜权威之外，用蔡澜这位行家的话说：“像陈先生提的‘腌虾仁必爽法’、‘炸鸡皮必脆法’、‘清蒸土鲮鱼妙法’、‘炒西洋菜去苦涩法’、‘猪肚制法’等等，以及和读者讨论的‘乳猪收火猪皮必韧’等文章，都是深入浅出地说明，聪明者一读即能领会。”这对于专业的大厨来说，可能最是难得，难怪文章结尾蔡澜这样号召“当今的许多大厨，基础没打好，成不了大器。如果肯努力的话，先从《入厨三十年》开始看起吧！”，其实蔡澜自己的饮食文章是达到深入浅出要求的。

后来细细展读，原来陈师傅非但粤菜了得，对于中国的其他菜系、包括西餐都有一手经验。大师傅就是大师傅。

这套《入厨三十年》纸张早已发黄，绝不像一位饮食界大佬的传世之作，倒像平常人家厨房里的手册，上面沾上酱油菜汁也无所谓。我本来无意要买（价钱也忒贵了点，尤其是同去友人都在大买学术书，自尊心自信心备受再三考验），但是随手翻到一篇写黄埔附近某道菜的菜谱时，我被他短短的百把个字吸引了，简直有了打入该行业的痴心——即使做不成大师傅，也能看看文章写法吧？这就是好菜谱的魅力吧？

这短短的百把个字是这样写的：

黄埔距穗郊不远，此地艇户甚多，艇家善制滑蛋，在此间过夜度宿者，辄喜吃该地艇户所炒之蛋，某巨公在黄埔军校时，更嗜之如命，因此驰名一时，通称为黄埔蛋。

这是“炒黄埔蛋”这道菜的“导语”（接下来写用料与做法），其他如“论蜜糖鸡之制法”、“论一只蒸百花鸡”，以及“斩鸡刀法”等等，气魄都非常大。



声音

舒伯特的四手联弹

特约撰稿人 马慧元 (加拿大·温哥华, huiyuanma@gmail.com)

给钢琴写大量四手联弹的名人不多,舒伯特写得恐怕最多,其次是勃拉姆斯和莫扎特。然而这些作品虽然是四手联弹中的重要作品,却不是重要的音乐,在他们自己的作品中只能算二流。舒伯特的四手联弹,粗略概括一下,就是充满了甜蜜但是坚硬、猛烈的欢乐,有些旋律和和声进行你知道那一定是四手联弹作品里的,为什么呢?因为它们不细腻。两人一合作,细腻和骄傲的东西没有了,诗意被替换成力量和厚度,轻灵少了笨拙多了,于是能表达的情绪就有限。钢琴这东西,还真是个人的乐器,浪漫的乐器。

敢情跟乒乓球双打一样,多了两只手,没帮太多忙,反而添乱。力气都用在合作上。管弦乐队当然不同,大家各司其职,好比足球队,不是互抢声音而是各管一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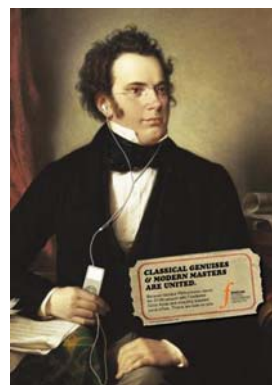
眼前这两盒舒伯特四手联弹,四张。这才想起来,舒伯特原来写了比我们想象的多的多的东西,只是我们常常忘记。那六首 *Grands Marches et Trios* (D819),长得要弹一个小时!

舒伯特的音乐充满糖分,从长度来看象那种很粘的糖,碰一下手就永远甩不掉洗不净;从口感来看又象那种很脆的糖,在嘴里四处开花,因为太艳丽太清脆,而且好旋律到处都是,简直均匀分布,让你毫无办法。

舒伯特的生活神话无论被重复成什么样的滥调,说起来仍然让人不疲倦地感慨:31岁就死了的人,当年这么拼命地写了别人几辈子写不完的音乐,而且样式那么多,虽然自我沉溺,但时有新鲜的幻想。人在幻想中可以活么?他以一个活得愉快的姿态,给我们做了个榜样。这个劳动模范,对世界所求得不能再少,只要你不拦他,他就不休息地干活儿。干活儿的人是幸福的,因为他有幻想,能看到幻想中的幸福。这样的人生,其实非常强大,只是我们难以体验,只能在音乐偶尔激发的幻觉中替他操回心而已。碰巧,刚刚看到英国作家普里斯特里(J.B.Priestley)的《文学和西方》中,说到浪漫主义的文学,包括作家和诗人,也表达了这样的意思:到了浪漫时期,文学不再是社会的声音,而是作家的个人表达。诗人不再是人中一员,而成为特殊的生物。他们不再满足于“麦子做的面包”,他们寻找蓝色的花朵,消失的童年,他们忘记自己是否犯傻,但理直气壮地宣布,对浪漫视而不见犹如在彩虹中闭上眼睛。

而舒伯特那灿烂的音乐,是“桃花乱落如红雨”的桃花,也是“轻薄桃花逐水流”的桃花。这音乐让人要么心碎,要么厌倦——简直没有中间状态。随便哪个句子拿出来,都能冲成一杯上好的豆乳。这浓得化不开的甜蜜,真可惜。如今写歌曲的人,能够上千万分之一,也不愁没有旋律了。

当然,想达到“中间状态”也是有可能的,那就是弹它,用身体、手指和头脑轮流经历,让理性和情感针锋相对。这个过程,恐怕会将青春软化、杂化吧。不是有那么多老头老太弹莫扎特么,青春音乐可醇可苦,跟青春一样。其实,老钢琴家弹舒伯特和莫扎特,最让我感动。私心以为这样不朽的音乐是给青春雕刻印记,供青春的疯狂也供衰年的绝望来听。



译介

百万交响：中国音乐大跃进（一）

阿莱克斯·罗斯：(Alex Ross)

翻译：成庆（上海，veron.cq@gmail.com）

三月，陈其钢，这位 2008 年夏季奥运会开幕式的音乐总监，在北京的一个新闻发布会上获得国家精神成就奖。他是十位获得此一荣誉的艺术家与企业家之一，该奖项是由一份中国杂志《生活》以及 Mercedes-AMG 联合赞助提供，Mercedes-AMG 是梅塞德斯—奔驰中的高档轿车级别。颁奖仪式在 798 艺术区里举行，充满典型的当代中国风格，也混合着民族主义的夸夸其谈、无节制的奢侈以及文化品位上的怪异，这个 798 艺术区由一个巨洞式的工厂区改造成展览区。四辆 AMG 汽车在会场上展示，四周环绕身着银色纳米时装的模特，正用一种假装漫不经心般的尊崇姿态围绕着“金手指”（AMG 的一款车型）。用幻灯映射在在墙上与天花板上的是“意志”、“权力”以及“梦想”几个单词，同时还有相应的中文翻译附随。“我们相信 Mercedes-AMG 将会给中国的民族汽车文化注入强大的活力。” Klaus Maier，这位梅塞德斯—奔驰中国区总裁如此说道。站在一边的陈其钢，脸上则带着疑惑的表情。在仪式开始之前他曾对我说：“我不知道将发生什么。”

当全世界的古典音乐家还在为获得媒体的一瞥而孜孜不倦的奋斗时，他们在中国的同行们却轻而易举的吸引着聚光灯。西方古典音乐是一笔巨大的生意，或者至少说是官方的生意。陈其钢这位温文尔雅的 52 岁的音乐家，一直致力于将西方现代主义与中国传统元素结合，当他离开从 1984 年就开始居住的巴黎回到北京，他曾经经历过文革的地方，他就被人提醒过古典音乐在中国的现状。在其北京公寓中的一次谈话中，他回忆起青年时代被压抑时所身处的世界，一个充满暴力的地方，古典音乐更是禁忌。后来在巴黎，他逐渐习惯了与一小群专业同事日复一日的参加各种音乐会的生活方式。在他去年访问北京时，陈其钢与导演过《英雄》与《十面埋伏》的张艺谋碰面，张负责导演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他询问陈其钢 2008 年是否有空闲时间。次日，这位作曲家就与奥组委的官员会面，他们请求陈其钢取消以后的计划。陈予以答应并且接受了主持奥运会



会音乐部分的邀请，这不仅仅是他感受到了官方的压力，而且还因为，他十分乐意接受指挥麾下 50 名作曲家来面对全球观众的挑战，当中囊括有古典与流行风格的作曲家。他提到，在美国，古典音乐作曲家是不会被委以如此重任的。

“在过去的 15 或 20 年里，古典音乐在中国已经成为时髦的事物。”陈用法语告诉我，“音乐厅人满为患，琴童数量相当庞大。当然这也会有许多问题。但是在如今的教育体系中，这种非常强有力的现象正在发挥其作用。当我访问就读过的小学时，我发现一个班级中 40 个学生中，就有 36 个学生在学习钢琴。这昭示着中国音乐的未来。”

访问过中国的古典音乐家、管理者以及批评家们，最近都开始不再抱怨，而是纷纷同意“古典音乐正在蓬勃发展”以及“古典音乐的未来在中国”这样的说法。据说有 3 千万到 1 亿的儿童在学习钢琴、小提琴或者是两者，这一数据是否准确，要依赖于你所参考的信息源。去年 2 月，就在纽约交响乐团访问朝鲜的前夕，美联社将纽约交响乐团指挥洛林——马泽尔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总结为：“面对逐渐减少的西方观众，古典音乐正在受到大量中国观众的接受和推崇，他们对异国文化的兴趣甚浓。”这位指挥家说：“中国的音乐家与作曲家正占据着纽约的音乐厅。就在四月，纽约交响乐团已经首次演出了谭盾的钢琴协奏曲，朗朗担任钢琴独奏；之后不久，大都会也重新上演了谭盾 2006 年的歌剧——秦始皇，多明戈在其中担纲男主角。

在短暂的访问北京后，我却对中国未来音乐的前景感到怀疑。音乐厅的确人满为患，音乐学院也成为追捧的对象，但是古典音乐却在商业与政治的压力步履蹒跚。在这种创作氛围下，奖惩制度仍然与前苏联并无不同，这无疑深深地影响了中国



音乐体制的发展。同时，北京广阔的声音景观却有如西方城市般混杂而多元：实验音乐之夜、充满时髦色彩的地下摇滚秀，流行偶像在商场里的高清晰电视里乱蹦乱跳，退休老人则在公园里唱着京剧。《礼记》云，“治世之音安以乐……乱世之音怨以怒……亡国之音哀以思”。所有这些不同风格的音乐在中国得以大杂烩，这或许会让儒家感到困惑无比。

对于中国的音乐企图心而言，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标志则是国家大剧院，这是一个巨型、低矮的钛壳穹顶建筑，就位于天安门的西面。这个统治良好国家的一些代表性建筑环绕四周：隔壁就是人民大会堂，而中南海，党的最高领导人的居所，就在街道的对面。江泽民的题字就镌刻在大剧院的入口处，江在 1993 年到 2003 年担任过国家的最高领导人，而且曾经表示过对古典音乐的热爱（在邓小平去世之后，江告诉记者，他常常依靠莫扎特的安魂曲来抚慰自己，度过长夜）。国家大剧院（北京人称呼它为巨蛋）院长陈平，是当地一位具有影响力的人物，他曾经主持发展了东城区的高档商场的建设。这个复合体原本计划在 2004 年开放，但是建筑师保罗·安德鲁，不得不在戴高乐国际机场候机楼部分垮塌后，重新来对大剧院进行评估。在去年底举行的开幕式上，陈平将这座建筑描述成一个“中国软实力崛起的具体实例”。

从建筑物本身而言，这座建筑并没有辜负来建造所花费巨额资金，但是作为一个音乐圣地，巨蛋问题多多。里面有两个主音乐厅：剧院里大概有 2400 个坐席，而音乐厅里则有 2000 个坐席。音乐厅有着理想而清晰的声响，但是却不够暖和。剧院的顶层楼座原本应该是声音效果最佳之处，但是如今乐团的声音却微弱且无色彩。少有证据表明在音乐厅的设计中，音乐本身扮演着重要角色。没有哪位严肃的音响工程师会同意这座音乐厅里的那部分多余空间，那将使声音反射和丢失。

就算是与在纽约一场平常的表演所听到的效果相比，这里的声效也并不能令人满意。他们暴露出了古典文化的缺陷所在，这种文化的历史还不到一个世纪，中间还时常被政治变局所干扰。中国的音乐教育体系可以产生著名的独奏家，但是它仍然有待去提升才华的广度以及协作精神，这是催生伟大乐团的要素。琴弦常要拂拭，铜管则要震耳欲聋。在首度拜访巨蛋时，我欣赏了一场由上海歌剧院合唱团与乐队演出的“图兰朵”。小号在第一个音节处就发出了刺耳的音符，而且还有许多失误接踵而来；有时候听起来这就像是一支民间乐队，一群高中乐队的成员在里面嘈杂不休。然而其中的嘈杂声却出奇的引人注目。该节目的想法是将普契尼的这部意大利化的关于中国皇朝的罗曼蒂克幻想剧重新改编；陈薪伊，该剧的导演，效仿中国传统剧院的理念，作曲家郝维亚则为这部割据提供了一种流动性的，或者是有点顺滑的结局，普契尼生前并未完成这部歌剧。从这一意义上讲，声响的粗糙性加强了效果，尽管那并不是我想复述的经验。

近乎满座的观众来到巨蛋来观看“图兰朵”以及其它的演出。这无疑让人印象深刻，尤其是考虑到票价成本的话：对于剧院里的一个顶层座位而言，我就付出了 480 元人民币，差不多相当于 70 美元。这一价格要比在大都会剧院观看一般演出的价格高出不少，而且一旦当你了解到，一个中国的普通白领工人一个月只赚大约 400 美元。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是买票入场的。剧院里的大部分区域的票都被分配给了政治人物、外交使节、CEO 以及公司代表；其中有人并不会来观看演出，这导致了尽管声称票都售罄，但是却有许多空座，而还有一些人则提前退场去参加其他的聚会或者是为了觉得无聊。一位北京作曲家略带嘲讽的告诉我，许多观众是来“看房”的，一旦好奇心得到满足，他们就会马上消失的无影无踪。



然而看到如此多的年轻人来到音乐厅，还是让人感到振奋，这要比你在大都会剧院与纽约爱乐的平常演出中所看到的年轻人的数量多出不少。在一次由 Michel Plasson 指挥中央交响乐团的演出中，我看到一群十几岁的少年，带着镶有珠宝的黑莓手机，身着 APC 牛仔褲，身上还有其它一些象征新兴富裕阶层的物品，交响乐团演奏柏辽兹的“幻想交响曲”的活力表现让这些年轻人感到十分兴奋，甚至置乐章间不得鼓掌的信息提示于不顾。一般而言，这些听众要比我过去的行为更加不合礼仪：一些老人仍然习惯于观看京剧的礼仪，交头接耳，对着舞台指指点点或者读报。吵闹声时常让人分心——领位员通常也无法禁止照相与录影——但是比起西方音乐厅里的一本正经而言，这里还是让人感觉轻松。音乐也没有被忽略；柏辽兹仍然拥有令人震撼的价值。

“巨蛋”里听众的年轻化反映出中国古典音乐状况的一个真实奇迹：如今在学习音乐的人群数量正在惊人地增长，不管是在学校里还是聘请家庭教师。成都的四川音乐学院据说有一万学生；而茱丽叶音乐学院却只有 800 名。一个美国高中生如果一天练琴几个小时，很容易被看作是一个怪人；在中国，这种安排可谓是家常便饭。

人民大学年轻的中提琴家齐悦教授对我解释道，音乐课程的泛滥有许多原因。其中之一，那些证明自己有音乐天赋的学生能够在高考中得到加分的照顾，这一点与美国的运动员并无不同。同样，音乐学院同样也有培育流行明星的传统，这激起无数的模仿者。崔健，这位中国摇滚音乐的奠基者，在上世纪 80 年代末成为流行歌手前，担任北京交响乐团的鼓手。四川音乐学院则培养出流行歌手李宇春，她在 2005 年参加了一个名为“超级女声”的比赛，类似于“美国偶像”的中国版，而且她凭借其嘻哈以及中性化的风格赢得了冠军（有数以百万计的投票者利用手机短信进行投票）。“超级女声”还被称位是中国最大规模的一次民主选举。或许由于这一原因，这个节目在 2006 年被取消。（该节目只是被限制规模，未被取消——编者注）

齐悦与他过去的老师，小提琴家何荣带着我参观了中央音乐学院，这个在中国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音乐学校。熟悉的空气弥漫在琴房里——肖邦的钢琴曲、罗西尼的歌剧、柴科夫斯基的小提琴曲。当我去聆听一堂作曲课时，发现课堂内容是关于流行音乐的创作。一位头发蓬松，身着 T 恤，名叫张天业（音译）的学生正在计算机前，忙于将鼓、吉他、钢琴与贝司进行混响。当我询问他喜欢何种音乐时，他回答说，“大部分都是流行音乐，偶尔才会听古典作品。”另外一位名叫瞿大维（音译）的学生则在钢琴前弹了一段半浪漫色调，半爵士风格的独奏，曲风颇有点类似格什温。换言之，在中国就读音乐学院并不一定等同于你自然而然就对古典音乐有兴趣。然而，各种音乐风格的糅合或许会对欧洲传统与更宽广的文化之间的融合会有所助益。

与大部分严肃的音乐家一样，齐悦颇为谨慎的反对了中国是古典音乐天堂的观点，尽管他预测说，这里将在 20 年到 30 年时间内成为一个主要的市场。余隆，这位中国最为声名隆誉的指挥家对此也持有同样的看法。“在外界，报纸总是说中国是世界上的音乐大国，或者有百万计的孩子在练习钢琴，”他说：“我并不那么乐观，事实上是，我只是努力的去为那些真正需要精美艺术与古典音乐的人服务。我并没有义务让每个人都喜欢它。”作为一位在德国接受音乐训练，而且具备强烈魅力的音乐家，余隆负责北京音乐节，如今他已经将中国爱乐乐团训练成中国最好的乐团，而且还在广州与上海担任客座指挥。为了保持与政治的联系，他也是一位政协委员。尽管如此，他却与古典音乐是一种“官方文化”的论调保持着距离，他从各种私人资源那里寻找资助，而且试图降低票价。尤其让人注意的是，他已经开始在巨蛋演出了。



对于一位如余隆般的音乐家而言，政治是难以回避的。自从 1989 政治风波之后，党对反对人士的打压，一方面压制反对声音，另一方面给予那些明哲保身者以奖励。Richard Kraus 在他的新书《中国的党与艺术》中写道，“从 1992 年开始，党已经放弃消灭异议人士的做法，而且转去鼓励所有的艺术机构努力赚钱。”那些体制内的人或许期望去一个能让他们赢得奖金的舞台，获得一个职务，占据要津部门，以及有着不错的薪水。艺术家们不再自我审查——这是一个中国历史中颇常见的习惯。在辛勤工作的背后是对政治的高度焦虑。评论通常是在新闻发布会上；的确，我曾被告知过，演出机构通常会给记者“红包”。批评家迫于压力，只好给出正面的评价，而且假如他们不这么做，他们将会被同行们口诛笔伐。一位我曾交谈过的批评家就对此表示厌倦，从而退出了音乐评论的圈子。

“假如你没有解放自己，你如何自由的诠释音乐？”这位前音乐批评家如此对我说。我们在东方广场上的北京君悦酒店大厅里碰面，这是陈平负责修建的商场中最奢华的一个。当诺拉·琼斯引起人群欢呼时，隔壁桌的商人正在洽谈生意。“这一切让人悲哀，”这位批评家继续说，“自由是最重要的事情，它能影响到一切。人们很害怕，而且他们的行为同样也让其他人感到害怕。我并不是讨论音乐，而是关于许多职业。值得说的很多，但是我时常不知道从哪里开始。很多事情都堵塞在我的大脑中。”

西方音乐正式进入中国，是在 1601 年，耶稣会士利玛窦向万历，这位明代统治时间最长的皇帝，献上了一架羽管键琴。就如 Sheila Melvin 与蔡金冬在他们的一本引人注目的书——《红色狂想曲：西方古典音乐如何中国化》——中引述到，“皇帝的太监在琴上试弹了一会儿，然后就将其闲置一边。它静静地躺在一个盒子中达数十年之久，直到崇祯皇帝这位明朝的末代皇帝，才发现了它而且找到一位德国耶稣会士向他解释如何演奏的。在之后的皇帝中间，康熙和乾隆都对西方音乐显示出浓厚的兴趣；后者统治了中国几乎 18 世纪中大部分时间，他组建了一个满员的室内交响乐团，太监们穿上欧洲人的服装，戴上假发进行演奏。

仅仅是在 19 世纪，西方音乐才真正地走出宫廷深墙，经常是以军乐与城市乐队团的形式出现。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交响乐团是上海工部局乐队（也就是上海交响乐团的前身），于 1919 年开始演出，其指挥是流亡海外的意大利指挥家梅百器。

创团伊始，乐团只招收外国团员，而且只呆在租界内，不过梅百器最终让乐团走出租界，面对中国观众演出。1927 年，萧友梅，这位在德国接受音乐训练的钢琴家与作曲家创建了上海音乐学院，这是中国第一所西式的音乐学校。上海音乐的发展得利于一个充满活力的冒险家乐园，而且当纳粹兴起后，德国的犹太难民也逃难至此；当时上海音乐学院的老师就有阿诺德·勋伯格与阿尔班·贝格。

毛泽东凭借其权力，在 1949 年后开始鼓励输入音乐，尽管他仍然将这一切保持在意识形态界限之内。在中央音乐学院的图书馆里，我查阅着《人民音乐》过刊，这是一份 1950 年开始出版的家庭期刊，中央音乐学院就在这一年成立。其中有些歌名叫“我们辛勤创作”以及“交粮歌”。我的同行者告诉我，每篇文章都以自动的革命隐喻开头：“我们的音乐工人必须用无限的热情来进行人民音乐的创作活动。”尽管如此，作曲家们是在逐渐对他们的艺术进行现代化，尤其是在百花齐放时期，因为毛允许他们“运用恰当的外国原理和使用外国乐器。”

文化大革命开始于 1966 年，中央音乐学院也很快被关闭。西方古典音乐也被清除，与之一起被扫地出门的大部分都是传统文化。为了替换现存的剧目，江青，也就是毛夫人，委派创作了八个革命题材的“样板戏”。其中最出名的当数《红色娘子军》，这部戏在轻歌剧中拥有一定的俗名，剧中还加入了许多中国的传统音乐。作曲家不得不在江青所设定的十分怪异的形式框架中创作；在一个场合里，她赞美了柯普兰为“红马”所写的电影配乐，但是在另一个时刻，她却把大号排除在外。

我在北京时，男低音田浩江正在“图兰朵”一剧中出演 Timur 一角，他向我描述在文革的狂热氛围中是如何学习音乐的。他的首次音乐演出，是在北京锅炉厂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中担任手风琴手与歌手。（他将这些都写进一本充满吸引力的传记中，名为《浩歌江上》）

他的父母过去在总政歌舞团就职，各自担任指挥与作曲，但是他们受到怀疑，并且最终离开北京。有一天，田父说不得不处理掉所有的唱片收藏。田浩还记得当他砸烂唱片时所感受到的孩子气的快乐，让人颤栗。

毛去世后，江青也随之垮台，古典音乐家也开始不再四处躲藏。当中央音乐学院在 1978 年重开时，8000 人申请竞争一百个招生名额。首届班级培养出来的作曲家们如今正在定义当代中国音乐的今天：谭盾、陈怡、周龙、陈其钢以及郭文景。在无数的访问导师的指点下——其中有流亡海外的现代派作曲家周文中，他是在 1946 年去往美国，然后在哥伦比亚大学谋得一份教职——这些作曲家迅速的自我现代化，学习序列主义、随机音乐以及其他新奇的事物。同时他们开始在声音的结合上开始作出一些新鲜和重要的尝试，尤其是他们将传统中国音乐中的清晰旋律同重金属的嘈杂声混合起来。几乎所有的学生在文革期间都被迫从事体力劳动，或者在乡村学习民乐，所以当进入学校时，他们已经掌握了足够多的中国文化遗产。



达尔文来拯救

——部分学者相信进化科学能振兴文学研究

布里特·皮特森（BRITT PETERSON）

翻译：陈丹丹（南京，Cheryl@live.cn）

面对迫近的天启（不管是不是想象中的），会出现许多先知。对于几乎自创立之初就在想象自身灭亡的文学院，先知们似乎总是指望特殊而具体的科学提供解药。20 世纪初，当作为现代学科的文学批评初具规模时，学者们把注意力放在了语文学上，认为它比纯粹的文学分析更系统化。到了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赋予文学理论一种准科学的严密性成了初次登场的新批评派的目标：他们细致地指出一首“好诗”形式上的特征，以及如何发觉它们。接着是 1957 年加拿大批评家诺思洛普·弗莱在《批评的剖析》中著名的质询：“假如批评既是科学又是艺术会怎样？”同样，20 世纪 60 年代起从法国渗入美国的部分后结构主义思潮也把语言学和语言分析理论视作为根基。

不过，在支持科学派的积极分子中，很少有人建议文学研究者像科学家一样使用类似积累数据，提出、测试假说的方法。即便弗莱也说，虽然批评家应该懂一些自然科学，“却不必把时间浪费在模仿科学方法上。听说有篇博士论文列出了一个单子，把哈代的小说按照忧郁程度的百分比排序。这种做法不值得鼓励。”

然而，过去的十多年，文学研究者的一批中坚力量开始鼓励的正是这种做法。近来他们的呼声尤其响亮。其中风头最劲的一派（至少在非学院媒体上）是文学达尔文主义，其著作强调对文学文本中行为进化模式的发现——《伊利亚特》是从统治和攻击的角度，简·奥斯汀是从求偶仪式的角度——并且坚决反抗他们所认为的反科学文论（如后结构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三十年的统治。古怪的是，这些批评家最近几年长期荣登《纽约时报》的版面，而今年五月，作为文学达尔文主义棋手（同时也是华盛顿与杰菲逊学院兼职英语教授）的乔纳森·戈特沙尔还在《波士顿环球报》的思想版解释了为什么这种方法是他的“道和光”。

他的评论在博客界也广受瞩目，原因可能是它们触及了文学界的伤心事：目前几乎是随意流传着的传统文学研究的式微或已然死亡的观念。衰亡的征兆层出不穷：从视书籍为过时技术的讨论，到紧张的就业市场，再到越来越依赖兼职工作的人文学界。许多学者和戈特沙尔一样，视文学理论为离间学生和学科的力量，其对学科的分化有时已经发展到了引发彻底论战的地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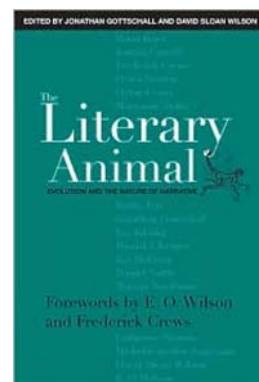
尽管如此，许多文学学者对文学达尔文主义将拯救文学院持怀疑态度。其中一些最强烈的批评反而来自可能被视作同盟的人群——其他的被松散地定义为开辟新天地的文学批评家，他们在研究中采用科学理论甚至是（在某些情况下）实证方法。文学达尔文主义者是“一小撮视自己为事业殉道者的人……因为他们期待其他所有文学研究者的谴责，”用认知方法研究文学的肯塔基大学英语教授丽莎·詹赛恩如是说。“我认为，他们虽然取得了很多媒体报道，其理论实际上并没有吸引多少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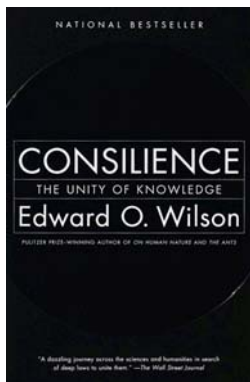
文学达尔文主义者对此不敢苟同。戈特沙尔在《波士顿环球报》的文章就是一篇振奋人心的宣言，勾勒出文学理论界惨淡的现状，指出科学方法是眼下唯一的救生筏。“文学教授应当采用科学的研究方法、科学的理论、科学的统计工具、和科学对假说和实证的坚持，”他写到：“否则的话，文学研究只能消亡。”他提供了两个应用的实例。一是刚刚发表在《人性》期刊上的研究：在世界范围内收集童话中关于美女的描述，以检验西方的故事是否特别强调女性美。二是对“500 位文学学者和书迷”的比较研究，根据他们对十九世纪英国小说中人物的反应来计量作者是否真的已经死亡——即，文本的意义是否由每个读者的特殊经历而决定，如文化理论所说的那样。

这两个实验的选题不是偶然。文学达尔文主义自视为文化理论所有形式（马克思注意、后结构主义、弗洛伊德和拉康的心理分析、女性主义，等等）的最主要反对者。在文学达尔文主义者心目中，文化理论——主观、刻意地晦涩、有政治意图、基于过时的臆断——是侵袭学术界的疾病，而对症之药正是科学的严谨。“文学理论的许多伟大思想在别的领域中都被实验后摒弃。心理分析在心理学界已没有生命——它仅存在于人文学科。马克思主义在政治理论和经济学课堂上也没有生命，”戈特沙尔说。“我的观点是，我们从这些坏的理论出发，建立在错误的前提上的研究肯定是错误的。”当然，他引用在《波士顿环球报》上的实验结果表明，批判西方传统的女性主义对美人的理解与众不同，而后结构主义“作者死了”的观点也是错的。（并非所有的文学达尔文主义者都赞成戈特沙尔这种对定量研究的依赖；其他人更倾向于将科学思想视作阅读的理论框架，而非研究指南。）

文学达尔文主义引人注目的另一原因是它集合了不同学科领域中支持进化论的学者。密苏里大学圣路易斯分校的约瑟夫·卡罗尔；奥克兰大学的纳博科夫学者布莱恩·博伊德等戈特沙尔式学者与进化心理学家有不少共同观点。哈佛大学的进化/认知心理学家斯蒂芬·品克在 2002 年出版的《白纸一张：对人性的现代否认》（Viking 出版社）读来像是戈特沙尔和卡罗尔作品的姐妹篇：“20 世纪精英艺术和文化的主导理论是从对人性激进的否认中派生的。其遗产之一是丑陋、费解、且无礼的艺术；其二，是装腔作势、莫名其妙的学者。他们还为人们成群结队地远离而惊讶么？”去年发表在《哲学与文学》杂志上的，针对文学达尔文主义精华文选《文学动物：进化和叙述的性质》（西北大学出版社，2005）——由戈特沙尔和纽约州立大学宾翰顿分校的生物学家大卫·斯隆·威尔森编辑——的书评中，品克写到，除了几处方法论上的问题外，此书“令人兴奋”。“目睹一个新学科的诞生是非同寻常的事，”他补充道。

但是，文学达尔文主义在主流文学理论界远没有如此受欢迎。2005 年，哈佛大学英文教授路易斯·莫南德在提及 E.O. 威尔森所著的《一致：知识的统一》（科诺夫出版社，1998）时写到：人文学院“绝不应要求一致，那是与魔鬼讨价还价。”科学家们批评戈特沙尔的实验方法不是很科学，而文学家们也质疑文学达尔文主义的文学性。文学博客作者，加州大学伯克分校研究生纳塔利娅·切奇雷慷慨激昂地声讨：“作为文学评论者的我们究竟该做什么，戈特沙尔似乎一无所知！真是令





人震惊。”谈到戈特沙尔关于西方社会在性别歧视上并不孤立的结论，切奇雷质疑道，“戈特沙尔能找到别的说过这种话的学者（复数）么？我是说真正的文学评论家，而不是纳奥米·沃尔夫（美国著名女权主义及青少年性问题作家——译注）。 ”

文学达尔文主义者料到了，甚至几乎追求这种反对的声音。这些学者常将自己视为局外人：因为反传统的研究而拒绝名牌高校的工作机会、终身教职和补助金。仍是兼职教师的戈特沙尔声称任何“有主要达尔文主义倾向”的学者都不会有终身教职，除非原本是从更传统的途径出身。

“我们倡导的观点与多数在聘用、编辑委员会工作的教授及同行审查组的主要成员背道而驰，甚至会构成威胁”他说。而卡罗尔“热切盼望”有一天能够“坐下来完成工作，”而不是被迫不断地解释或为他的研究方法辩护。

但是，戈特沙尔和卡罗尔都确信他们的观点最终会获得主流认同。卡罗尔谈到文学达尔文主义在用“萝卜和棒子”影响文学界：“棒子指的是‘主流学术圈’被围攻、孤立，而萝卜是说他们会觉得有新的事情可以做。”戈特沙尔补充道：“我认为有抱负的年轻学者、研究生等，会在这儿看到一些有魅力的东西，给他们的研究提供动力。当然也很可能会有阻力，但是我再一次说，我对这些想法有信心，它们会获得胜利的。”

不过令人吃惊的是，攻击也从同样遭排斥的学者中来，比如肯塔基的詹赛恩，她的课题在诸如认知理论、实证文学研究等的相关领域。这些学者同文学达尔文主义者一样，在不同程度上，工作于文学理论和科学方法的接合处。转向认知理论的人可以分为几类，包括使用实证数据的文学评论家，他们与精神学家、实验心理学家合作，研究脑功能和阅读的联系。拥护文学达尔文主义者的南茜·伊斯特林（新奥尔良大学）就把认知理论和进化心理学都融入到工作中。伊斯特林广泛地使用各种方法，包括基于达尔文理论的女性主义，以及她自称为“认知生态批评”的学说。而对达尔文主义会成功地永久转变文学研究的态度最为怀疑的，是那些支持科学，但不使用进化心理学方法的文学学者。

对于一批使用认知科学理论的文学研究者来说，他们反对文学达尔文主义的理由可能是其自身背景中文化理论和科学的结合，而且这种把30年来的新思想都视为垃圾的论调令他们心生戒备。F.伊丽莎白·哈特，这位拥有文艺复兴文学研究的背景，并对认知理论的兴趣（比如它是如何影响隐喻的观念的）的康涅狄格大学英语副教授就说，她不信任如此弱化文化对个人影响的理论。“我们要找出一种理论，可以创造、解释或顾及人与人之间类似代理的接口——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就是压在个人身上的上层建筑。必须得有一个可以解释这两者的模型，”她说。詹赛恩则指责文学达尔文主义者“把婴儿扔到装了水的浴缸中……说科学方法能帮助我们阐明所有文学理论研究的命题多少有点可笑。”

目前在斯坦福大学的意大利文学研究者弗朗哥·莫瑞提不是认知文学研究者，但他的著作中由于经常使用科学和数学方法的缘故，常有实证主义的印记。他写作有关进化论和文学理论之间联系的文章已经很多年了。他在一封电子邮件中重申，文学达尔文主义者认为文学形式与外部问题有关，而没有加以讨论，从而避开了文学的本身的特性。“如果文学达尔文主义能够改进我们对文学形式的领会和解释的话，那将是向前迈出的一大步。但是如果它逃避或对文学形式视而不见，就完全没有意义了。”

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的约瑟夫·P.塔比教授做的是认知理论和20世纪文学的交叉研究。对于戈特沙尔的童话实验，他如是评价：“如果你对性别歧视感兴趣，你要看的不只是刻板印象的表述，还需知道叙事是如何发展的；了解叙述中结尾的问题、顺序的问题以及有关叙事学的问题。我不确定仅凭采样和统计处理，你能走多远。”纽约时报杂志作者D.T.马科斯也表达了反对的观点：“我不认为延展一个灵长动物的想象就能催生出《荒原》或《芬尼根的觉醒》。语气、视点、叙述者的可靠性——这些文学现象往往逃脱了文学达尔文主义的视角。”

还有人攻击文学达尔文主义者的其他方面，比如他们科学研究的资格。尽管一些自称文学达尔文主义者的人确实有科学背景——为《文学动物》执笔的也有几位科学家，包括E.O.威尔森——这个队伍中的很多人没有统计学或进化生物学的背景，而且他们常常独自工作，而不是和科学家们一起，这和许多认知理论家或实证文学批评家不同。（卡罗尔说他最近给自己上了一阵子统计分析“速成班”，不过他和戈特沙尔都没有任何正式的培训。）使用认知理论的波斯顿学院英文教授阿兰·理查森在电子邮件中写到，他在工作中见过进化文学理论家“被研究设计和方法论的基本错误难倒。”

大卫·迈阿尔是阿尔伯特大学英文教授，他与一位心理学家合作进行读者对文本反应的实证研究。他认为文学达尔文主义“只是解析文本的另一种方法，我还不清楚我们是不是如此迫切地需要它……除非他们真能告诉我们一些有关文本性质的新东西。而如果有新东西的话，总有办法通过实证研究来验证。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对实证研究的抵触似乎是真正

的缺陷。很遗憾他们没有继续走下去。”迈阿尔的建议是，去实证测试一下读者是否真的受影响而思考求偶策略等达尔文主义者着读入文本中的进化模式。

戈特沙尔和卡罗尔已习惯于回应这些批评，其实他们已在在大多数出版物中先发制人。即将出版的期刊《风格》中，卡罗尔将同三十多位学者就文学达尔文主义较量。至于他们的方法能否解决文学问题，戈特沙尔在即将出版的《书，文学，科学，和新人文学科》（帕尔格雷伍·麦克米伦出版社）中写到：“我怀疑总有一些很重要的人文学科问题是无法用任何科学工具解答的。而且，我也没有暗示合理的定性研究对产生更可靠的知识没有帮助。”

戈特沙尔在《文学动物》上的文章还包括为定量文学研究的长篇辩护，断言在人类知识的历史中，许多领域（包括医学和社会学）都曾拒绝数据分析的引入：“重点不在于这些领域的研究者们最终发现每样东西都能简化成数字。而是他们意识到定量和定性工具对于适度完整的研究都是不可或缺的，每种工具适合不同的问题。”（除了这些纸面上的调和立场外，戈特沙尔本人似乎常常吃惊于对传统文学研究的全面谴责，谨慎的说：“我不是在号召彻底的学科歼灭。”）

文学达尔文主义对自身科学严谨性的问题也备好了答案。卡罗尔说：“不少人对此提出质疑，其中一种回应是，许多这么说的并没有读过大多数他们拒绝的文章。”戈特沙尔指出他的不少文章都发表在科学刊物上。然而，他也承认在文学达尔文主义的名下“也存在着很多垃圾。确实有很多垃圾。但问题是这能证明什么呢？证明文学达尔文主义是无用的、圣战式的么？或者证明我们需要更努力？因为你也能在别的领域找出一长串定量研究令人沮丧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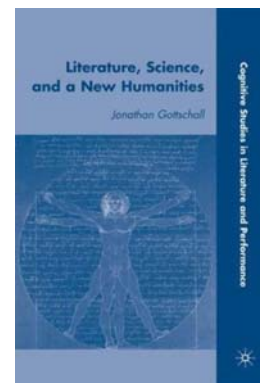
至于文学达尔文主义是否能拯救文学批评，学者们也观点不一。确实，其他科学理论和实验研究学者似乎远不及戈特沙尔和卡罗尔病态。许多人看见自己专业内的人数越来越多；要知道在认知理论和文学研究领域，学者们孤独地工作数十年，直到现在才受到同僚、专业研究所和学术出版社的更多关注，这种现象并不鲜见。他们的未来似乎比进化文学理论家光明的多，也许是因为文学圈子外面的认知研究领域很热门。

事实上，詹赛恩认为文学达尔文主义会恶化文学院师生失业、无望的困境，而不是反过来：“比方说我是个英文教授，带研究生，然后我跟他们说：你们要把过去三十年来同僚们从事的工作都忘掉，因为那些都是文学理论，全是错的，现在你们有这个新的科学方法可以使用。那我来问问你吧，要去找工作的研究生听到这番话后会是什么反应？”

甚至宣称文学研究的终结的主流学者也很警惕文学达尔文主义提供的解决办法。威廉·德雷谢维奇，耶鲁大学英文系前副教授，曾在《国家》杂志中刊载过一篇阴郁的文章，后来常被戈特沙尔引为天启的证据。德雷谢维奇称：“不是说他们的一些方法没有用；我不打算说这样的预言。我担心的是他们没有看到或不愿承认科学和文学属于不同的知识领域，反而带着这种想法继续研究。”安德鲁·德尔班科，哥伦比亚大学人文教授及 1999 年《纽约书评》文章《文学的衰落》的作者，认为自己的观点“谨慎地开启了怀疑论调。那种我认为由此引发的简单化见解在向着完全错误的方向发展。但我觉得人们也不该拒不考虑它。”

然而，对于文学达尔文主义者来说，现在的情形实在危急，以至于他们认为自己的工作不论缺点在何处，都是拯救文学院最后、最好的希望——当然，如果文学院有勇气接受这种必然结果的话。戈特沙尔说：“我们很绝望，文学研究领域真的很绝望。大家情绪低落，没人知道该做什么。所有人都在说我的不是——其实从某种角度说，他们和我一样持批判态度，觉得旧的方法走不通。”

“但到了讨论如何解决问题，如何找回文学之于世界的意义和重要性，以及如何确保学科的位置时，人们对于这些更敢做敢为的解决方法却胆怯起来。”



授权网络首发媒体: [学术中国·阅读在线](#)

授权纸面首发媒体: [南方都市报·阅读周刊](#)

鸣谢: 季风书讯

合作媒体:

搜狐新闻
news.sohu.com

搜狐读书
book.sohu.com

文章版权作者所有, 欢迎订阅, 转载请注明出处和订阅信箱: shrbooks@gmail.com, 文章和图片如果涉及版权问题, 敬请来信告知。